

# 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

作者：老田

## 目录

前言 .....	1
一、毛泽东对文革的有效干预与无效干预——以武汉文革运动进程为例.....	2
1、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计——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	2
2、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干预——支持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机会主义行为.....	4
3、毛泽东的第三次干预——应对党政干部罢工的局势.....	8
6、镇压造反派与向右破局的占优选择.....	17
7、官场怨气与“五七一投机收益” .....	21
8、“五七一投机收益” 争夺预示着毛后时代的政治走向.....	27
9、毛泽东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干预了文革?.....	31
二、文革博弈僵局的形成与向右破局的占优选择——当权派对造反派系列镇压过程....	35
1、当权派的习惯性镇压.....	36
2、对造反派的报复性镇压.....	38
3、革委会的组成成分变化.....	42
4、博弈僵局的形成与选择向右破局的两个条件.....	44
5、右倾翻案风与投机性镇压.....	47
6、反文革派对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	53
7、周恩来是如何累跨的.....	54
8、以巨大的镇压规模去确立新规则.....	57
附件 1：毛泽东教授的历史研究生戚本禹：怀念戚本禹同志 .....	61
一、好老师和好学生的几次良性互动.....	61
二、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支持青年人起来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	67
三、对照文革后的史学研究领域的变化来看待“作为政治研究方法的历史” .....	72
四、为什么革命和历史都是永恒的.....	79
五、附录：姚文元、戚本禹和孙达人文章的论点摘录.....	87
附件 2：戚本禹同志追悼会侧记：风雨激荡五十年 生死英雄戚本禹 .....	94

# 前言

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有着一个独立于官僚体系的造反派组织，以及由这个组织所主导的对官僚体系的批判。本文以口述史资料为基础，从造反派的境遇和视角，来呈现文革的政治博弈内容——文革的支持力量（文革派）与反对力量（反文革派）之间的博弈内容与过程。

从造反派的视角出发去呈现文革历史的优点，能够在造反派群体自身境遇的基础上，去呈现反对文革的力量组成及其策略选择集合，弥补已有的文革史中间的常见缺陷：未能恰当地区分文革中间相互对立的力量及其策略集，这一问题导致的重大疏漏是遮蔽和掩盖反文革派对文革进程的主导作用。从这个研究目的出发，武汉文革比北京和上海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上海文革进入 1967 年之后，反文革派的民间力量（保守派）被整合进造反派组织中间去了，使得上海后续文革博弈过程显得独特，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大为不同。而北京的文革运动较为切近地处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干预之下，反文革的民间力量（保守派）一开始就发育不良，这也是有别于全国的特殊状况。在多数地方和多数情况下，反文革力量始终在组织和力量方面占据优势和上风，这才是全国文革的普遍状况。武汉文革进程，恰好是与这一状况相一致的。

在本文中间，先从毛泽东介入或者干预文革进程的角度出发，简单梳理文革的演进过程。然后，以造反派的角度，去呈现反文革派的力量与策略选择，揭示出文革十年期间真正主导运动进程的力量。最后，从群众作为政治主体的角度，去对照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与解放政治的潜能。



# 一、毛泽东对文革的有效干预与无效干预——以武汉文革运动进程为例

在官方文革史学中间，坚持文革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结论，这除了体现出一种以个人作用去解释历史和政治的方法论之外，较为具体的意图是掩盖反文革力量的优势地位及其表现。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文革过程走向，去检验毛泽东到底如何有效地干预了文革进程，以此去对照作为文革特色的造反派及其批判活动与毛泽东个人的关系。

## 1、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计——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

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是试图通过学术批判活动来建设吻合新制度需要的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其中史学领域的学术批判最受他本人关注；在学术批判中间涉及到清官是否能够调处社会矛盾以及统治阶级是否有着采取让步政策的自愿，这两个主题都涉及到被统治阶级的政治主体性建设的必要性问题。但是，这个批判活动难于展开，毛泽东本人所欣赏的年青人如戚本禹、姚文元等所写的文章，往往难于发表和传播，而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却受到官场强势人物的庇护，不仅中宣部周扬等人以权力介入学术批判去支持“权威们”，彭真为了保护吴晗甚至单独出台了一项政策——“二月提纲”，在这项政策中间，彭真为了实现庇护吴晗的目的，采取了两项策略：一是要“有计划地造成一场混战”把郭沫若和范文澜拉出来陪斗；第二项策略是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很搞笑的是，彭真要批判的左派除了戚本禹等人之外，还包括写文章与吴晗商榷的邓拓）。而且，除了官场的阻力之外，作为学术批判对象的权威如吴晗、翦伯赞和罗尔纲等人，都不愿意认真回应学术批判。借用法国学者布迪厄有关学术场域的分析，毛时代中国学术场域的大资本（权威们），除了受到权力的过度庇护之外，还对真正的学术争论和交流不感兴趣，这与市场上垄断企业的行为模式有着高度一致性：首先关注的是市场垄断地位而不是技术进步。

[对于最受到毛泽东重视的历史学术批判方面的详细考察，参阅老田文章：  
毛泽东教授的历史研究生戚本禹，网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redman/2016-05-13/113193.html>]（详见附件 1）



刘少奇与彭真

文革期间各种人物及其言说，在政治博弈中间进行相互塑造，名实脱节现象较为严重——口头上说的和心里想要做的差别很大。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为使其免遭批判单独出台政策，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词进行粉饰，实质要做的确实混战一场和掉头来批判批评者。在后文革时代的官方史学中间，重新翻转了对这一轮学术批判的估价，把小资本说成是具有投机心理并得到过过度扶持的“棍子”，比附为权力粗暴地干预学术自由；这样的定论在 1965 年 3 月 3 日邓小平就说过，依据这个看法，在毛时代中国学术场域中间，小资本拥有着过度的话语权和传播机会，能够非正当地威胁大资本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以机会主义策略介入学术竞争还能够取得胜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显然是因为小资本得到权力的过度扶持而大资本得不到类似的支持，这恰好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已有的事实都是相反的状态。

况：按照毛泽东的观察，学术场域中间主要特点是党阀支持学阀，目前看到的证据都是权力支持大资本而不是小资本，这使得学术批判确立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努力无法持续下去。在各地省市委主持的学术批判中间，选定的批判对象往往是与高官们有着个人冲突或者不洽的学界人士，而不是因为学术方面的问题。这些状况，使得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革方法无法持续下去。[同上]

应该说，毛泽东对文革最初设计，是彻底失败了，这是 1966 年 8 月份之前的主要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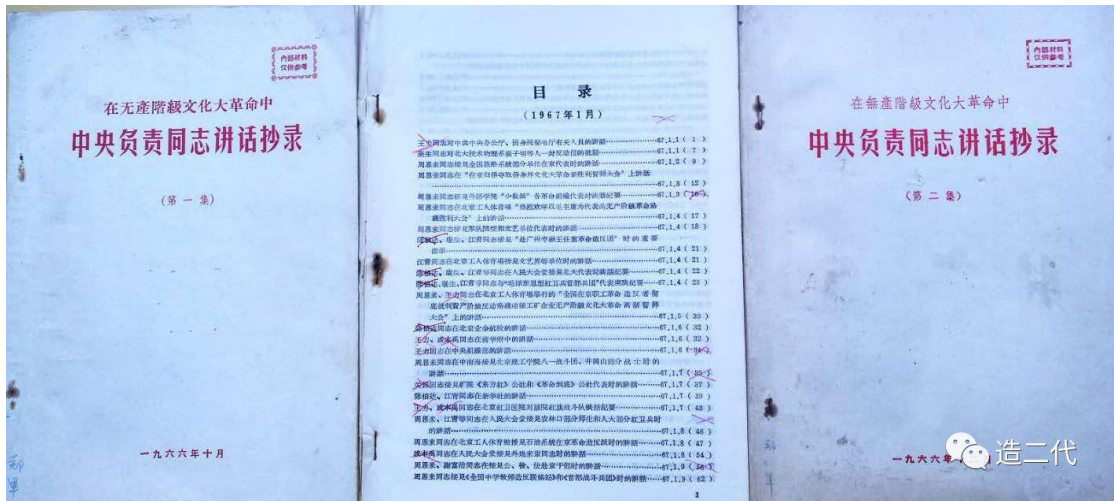
## **2、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干预——支持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机会主义行为**

1966 年 6 月上旬，各地依据刘少奇等人的安排，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除了选定各地高官们不喜欢的人作为揭发批判的对象之外，还在学生和教师中间进行分类排队，预备“抓右派”，这两个方面的安排，都受到部分学生和教师的批评，在北京更发展为激烈的“驱赶工作组”的浪潮。7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经过六天时间的考虑，决定撤销工作组同时支持学生对于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模式的批判，然后，重新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于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之后次日在报章上公开发表。



此后，依据毛泽东的要求，政府高官和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出面接见群众和讲话，支持群众的结社权和对于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批评权。1966年10月，依据文革小组与北京高校少数派座谈的结果，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这实际上是把文革早期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进行的政治行为模式（曾经被毛泽东本人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和“五十天白色恐怖”），宣布为彻底非法。在这样的支持之下，造反派从早期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打压的少数派，成长壮大并于1966年冬天在高校里成为占据优势的组织和力量。



首长公开讲话，肯定符合政策和道德标准，都能够起到支持群众的有组织批判意识的作用

1966年7月底至8月初，毛泽东对于文革进程的干预，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型，放弃了他对文革的最初设计，转而支持群众组织起来去批判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后，通过学术批判形成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设计，被支持群众批判政治异化及其人格化群体（当权派和保守派）所代替，这是全新的运动模式。这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重大干预，后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对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模式有着明确批判意识的有组织群众力量，这股力量在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明确支持下，逐步壮大，成为整个文革期间反文革派的坚定对立面。

文革小组的角色，近似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监督人和执行人，由此也受到反文革派的痛恨和针对。针对怀仁堂会议对文革小组的发难，毛泽东于二月十九日凌晨讲话指出：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这段话在两个方面都是很准确的，文革小组的职责就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及其通过的“十六条”，同时，官场中间反对文革小组的势力实质上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所有针对小组个人的反对策略都不过是掩饰。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左一）、江青、姚文元（左四）、戚本禹（右四）、王力（右三）、关锋（右二）、穆欣（右一）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表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这第二次干预的有效性体现在：民间对官场的批判性力量能够生存下来并成为参与政治博弈的一股力量。全部的反文革派力量及其采取的策略集合，都是针对着造反派组织力量及其策略的回应，为此，反文革派力量还确立了对支持造反派力量的具体策略，这成为整个文革政治博弈进程的基本特点。





### 3、毛泽东的第三次干预——应对党政干部罢工的局势

在造反派力量壮大之后，学校中间的保守派在 1966 年秋冬天陷入瓦解状态，当权派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动员对政治无感的工人和农民去反对学生的策略也累遭批评，并且由于已有禁止调动警察和军队去镇压学生的政策，各地当权派对于文革的积极反对策略大多归于无效，由此开始了消极反对策略——主要是离开工作岗位并不再担负管理职责。

当权派在 1966 年冬天的反对策略接近于罢工，这迫使毛泽东要么让步使其满意，要么重建全国性的第二个指挥系统。毛泽东被迫选择了重建第二指挥系统的方案，由此，军队从国家机器的后台走上前台并在新的指挥系统中间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是关于“军队支左”各项决策的真实背景；同时，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同时为了避免生产停顿起而“接管”基层的生产指挥权，这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之后就被称为“夺权”；同时还争取前党政官员参与新的指挥系统来发挥作用，这个称为“亮相干部”；这三部分人后来是新成立的革委会的“军干群三结合”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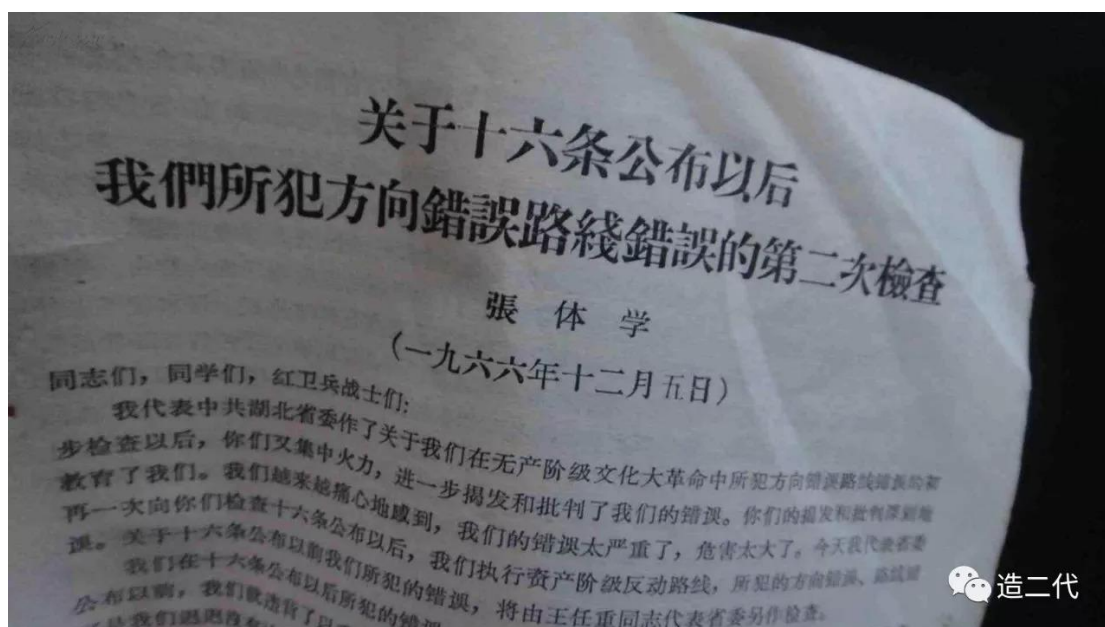


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组织掀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2 月 23 日成立上海市革委会。

在来不及成立革委会的省份，往往迫于形势选择“军管”，在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这段时间，压倒一切的新问题是党政干部罢工引起的秩序担忧，军队作为唯一的有组织力量需要出台担负主导角色，有组织的群众也是一股力量需要为秩序恢复做出贡献，也尽力争取前党政干部参与进来。这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三次重大干预，这一次干预不是主观设计出新的运动内容，而是针对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找出答案——哪怕是应付式的答案，而这个问题的设定则是由反对文革的党政当权派设定的。

在湖北省和武汉市，自1966年10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不久，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从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之后，就提出“三道防线”的策略：

把年轻力壮的小干部组成第一道防线去抵挡学生造反派的冲击，把中层干部组成轮流值班的班组——这是“第二道防线”——去搪塞学生提出来的尖锐政治问题，最高级别的大干部大都穿上军装躲进军队招待所形成所谓的“第三道防线”，在这三道防线形成之后，近乎百分之百的党政干部脱离领导岗位，形成了实际上的干部总罢工态势。[对魏绳武的访谈，2007年8月]



轮流值班的中层干部，都不敢或者不愿意就省市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政治表态，这会被视为官场叛逆而遭到集体仇视；各种表态往往止步于经济上让步——“经济主义妖风”就是这么刮起来的，上海陈丕显的

策略交代是“经济上的要求不要顶”，群众组织只要是要钱要物都无条件满足；而湖北张体学更为主动和积极地指出：娃娃们起来革命，多给几个钱，热闹些。

在上海，市委干部连同其家属都逃走一空，仅仅把柯庆施和张春桥两家丢在市委家属院里。[《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5 年]在湖南省，唯一坚持工作岗位、不以罢工进行对抗的省委书记只有一个，所以格外受到毛泽东信任：“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第 207 页]从这一点出发，毛预备借重章来解决湖南问题。

##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造二代

党政干部选择总罢工，逼迫文革升级到重建第二指挥系统的地步，这是文革最后陷入混乱的关键步骤。对于各个文革参与者群体来说，这都是至关重要的意外，对于当权派来说，这个重建指挥系统的选择，等同于把各级政权作废了，绝大多数官员由此丧失了权力和地位，这在官场形成近乎一致的利益剥夺感受并加剧了共同的反文革意识，也由此催生了一种自动代表官

员共同利益的努力，1967年2月16日发生在怀仁堂的“二月逆流”就是基于官员共同利益的一次表达，其中谭震林的言论准确最契合了当权派的痛楚：你们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革命四十年落个妻离子散。



对于造反派来说，作为政治异化的批判者角色，不超越自身的经验和认识水平，但作为秩序维持者角色，则与其批判意识的指向有着根本性矛盾——此时重新提出了如何实现政治整合并团结保守派群众和当权派多数的问题，而且，造反派自身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学生，对于管理事务相对陌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准备；而对造反派更为严苛的挑战则是：**如何对待有形或者无形的政治利益？在政治地位和利益分化的驱动下，造反派是否会如当权派那样自动地吻合社会分化规则的作用？**

文革由此走入了不可控状态，一是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剥夺过多引发的激烈对抗，二是作为文革主体的造反派群众骤然进入了一个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新领域。当然，如果如毛泽东那样把文革视为“一次认真的演习”的话，那么，想要揭示的社会问题和缺陷的那个演习要有相当深度才行，这样隐含的问题才能够得到全面和系统的暴露机会，从而也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认识价值。



#### **4、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无效引导——关于团结大多数问题**

1973-1974 年毛泽东曾经在党内发起“三大讲运动”，希望干部逐步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求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大会上公开讲述自己对三个方面的认识。

在文革的系列政治博弈中间，不仅是当权派，就是造反派都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首先是如何正确对待政治博弈的对手——保守派群众和当权派多数，从而能够为政治整合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在政治整合过程中成为不自觉的障碍。如果把正确对待保守派和当权派作为重要的检验尺度，可以看到造反派与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重要差异和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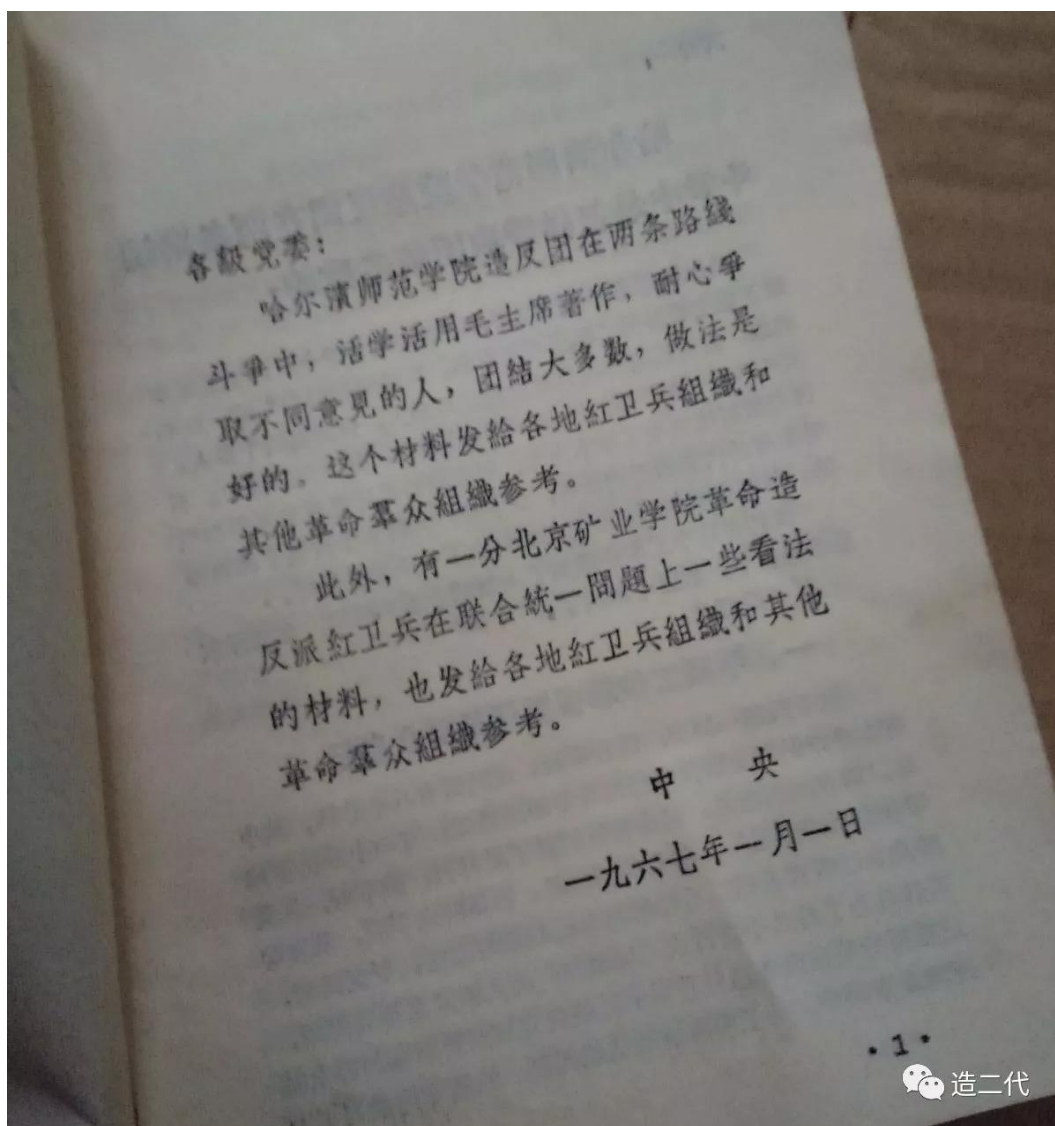
造反派的大多数，往往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这是其长处，造反派能够敏锐地看到政治生活异化的消极面以及推动政治异化的两个人格化群体——当权派和保守派，其局限在于未能超越这个批判意识去争取与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团结，在团结和互信的基础上去推进批判意识和问题的

解决，而往往是在批判意识的趋势之下，得罪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多数，推高其对抗性和相互不信任程度，使得问题无由解决，这在造反派占据上风 and 优势时期——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期和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一段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为了敦促造反派做好团结保守派和当权派的工作，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做过一些引导工作，但没有取得大的效果。1966年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姜文品和李玉桥撰写了《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和团结多数的》，这个经验由中共中央（1967）1号文件转发给各地群众组织，希望造反派做到“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董学章：中央批转哈师院造反团“团结大多数”经验的内情，载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结果收效不大。一位武汉造反派头头回忆说[对“武汉钢二司”勤务员柳英发的访谈，2015年7月]：

当时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文件，小报上也转载了，但我们认为对资反路线的批判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所以政策执行的时机还没有到，因此就没有办法落实。



到了 1967 年 3 月份，毛泽东亲自批发了天津延安中学按照教学班实现大联合的经验，以及贵阳棉纺厂按照行业和系统大联合的“归口大联合”经验，也都没有奏效。

由于造反派未能及时而自觉地形成团结对立面问题意识，此后中央在政策调整和执行方面的力度更大，变成了中央脱离造反派的认知而采取独立行动，在对待保守派和当权派方面形成了双方的认识落差和政见分歧。由中央介入和处理的革委会人员组成方面，早期成立的革委会都没有保守派的代表，在 1967 年夏天预备处理武汉问题时，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

军文革办事组的“六二六电报”中间，已经有了结合保守派进入革委会的意思。到了1967年9月，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革委会应该吸纳保守派的代表。此后成立的革委会中间，基本上都做到了吸纳保守派代表，据曾经担任周总理联络员的老李回忆，1968年辽宁省成立革委会时期，对造反派组织“八三一”、军队支持的组织“辽革站”和支持东北局和省委的组织“辽联”，都同等对待，每个组织进入省革委会的常委名额都是五个；辽宁省只有鞍山最早成立革委会未包括保守派，结果反而是鞍山的形势不太稳定。[对周总理联络员老李的访谈，2004年7月于南昌]



## 5、“三凑合”的革委会以及文革陷入博弈僵局

在革委会组成中间吸纳保守派，各地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干部大量进入革委会还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各地造反派非常不满，一些造反派认为革委会不是“三结合”而是“三凑合”，认为革委会成立之后的状况还是造反派受压和无权，依然保留着对革委会的不满和批判意识。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拥护革委会的群众说革委会好得很，但是，反对的人就说“革委会好个屁”，在群众中间出现普遍的好派与批派的对立。文革前期当权派和保守派的错误未经批判和审查解决，未来还有可能历史重演，对过去批判意识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担忧，都使得造反派不肯轻易搁置这个批判意识。





### 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

在武汉，因为七二〇事件的缘故，就没有结合百万雄师的代表进入革委会，因此保守派认为革委会只代表一派而不代表他们，现在，是从前的保守派对革委会怀有激烈的批判意识，说革委会只是一个“派委会”。革委会一经成立，就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挑战，难于建立工作权威，缺乏权威又导致难于顺利地进行管理工作，这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问题。

除了在革委会之外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不服从之外，在革委会内部也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成立革委会之后，各地主要是军队干部和前党政干部占据主导地位，这个革委会内部的主导群体对于参加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也怀有强烈的派性不兼容，时刻想要创造条件去之而后快，这就从内部威胁到了革委会的稳定性和权威了。

革委会所隐含的内在冲突，及其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是文革陷入博弈僵局的集中体现。九大政治报告主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提出希望，也算是准确针对了革委会内在的不稳定性。而革委会中间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干部，对于革委会内在的冲突，选择的解决方案，是把造反派赶出去，同时还把基层革委会搞垮和换血，结果是清楚的，在很短时间内，各地基层的革委会就被派出去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瓦解和架空，而作为基层革委会成员的造反派骨干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这是 1969 年九大之前的普遍状况。



## 6、镇压造反派与向右破局的占优选择

文革进行到成立革委会之后，对立的两派现在处在难于共存的博弈僵局中间，恰好处在调处僵局的领导地位上的高官群体，是具有管理成本“厌恶型”特点的军官群体，加上他们自身又是带着强烈的派性不兼容思路来处理问题，这就使得对造反派的压制远超维护秩序的必要限度。

进入1968年之后，当时的中央政策要求，是要支左的军队干部实现“支左不支派”和“一碗水端平”，这相当于是追求一种相对的“均衡”状态，据以

超越博弈僵局。但是，绝大多数地方在革委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军官，是选择与保守派紧密结合把造反派镇压下去的破局方式，这是“向右破局”的选择；最为极端的向右破局出现在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和支左军官马文波等人联合占少数的保守派（王海容、唐闻生等保守派只有 100 多人），把占据外交部绝大多数的造反派中间 1600 余人（造反派占据全外交部 2200 人中间的 1700 人左右），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结果外交部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帮子官老爷算是好人了，绝大多数人被少数人打成了反革命。[参阅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只有少数地区如上海，实现了向左破局。

全国最具有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徐州，先选择了向右破局，后来又转过来选择向左破局，第三次才选择均衡，结果是两年内先后成立了三个革委会，当地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说：**支得好、踢得对，一年一个革委会。**（第一个革委会“支派”占优，此派偏保；第二个革委会“踢派”占优，踢派是造反派。第三个革委会是按照中央要求实行两派联合的。）毛泽东本人对徐州问题先后有四次批示，并依据徐州的经验对革委会稳定条件有一个评论：“徐州已经翻了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毛泽东：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意见（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从全国的文革历史看，破除博弈僵局的方向选择，绝大多数省区是选择与保守派联合去镇压造反派，“向右破局”成为首选。作为例外的“向左破局”只有上海与河南，河南省是因为第一书记刘建勋出面支持造反派的批评权，同时引导各级干部正确对待批评意见，因此，成立革委会之前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对立程度就比较低，在革委会中间双方也能够相互合作。



1966年8月，在毛主席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全国的省委书记中唯一一个也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造反学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上海的情况则是全国最特殊的，在1966年年底王洪文等人所在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势，顺利地吸纳了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多数成员，此后赤卫队头头几次想要重新拉起保守派队伍都未能奏效，使得1967

年之后的上海文革中间再也没有保守派的有组织力量出场。在此种态势下，上海的当权派理性地选择放弃与造反派的对抗态度，选择政策所要求的“检讨、亮相与参加三结合”的三步走策略，以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许诺与造反派紧密合作的保证，获得重新返回权力中心的机会，结果到了1967年夏天，上海大多数厅局级干部都获得了“解放”与参加“三结合”革委会的机会。河南与上海的“向左破局”结果，通常被称为“造反派掌权”，河南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当权派在第一书记引导下当权派较少选择与造反派对立，而上海局面的出现则是保守派群众被造反派“团结”之后的结果。上海作为例外状况，可以视为实现“向左破局”所需的前提条件——造反派能够较好地团结群众中间的大多数（特别是团结保守派的大多数）。

在一定程度上，“向左破局”的权力格局中间，包括反对文革的当权派，较晚成立的革委会中间还包括保守派成员，这是一个相对的“均衡”局面。而选择向右破局的结果，虽然没有在革委会中间直接地清除造反派代表（1969年中央下文规定：凡属要撤销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席位需要报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杨道远1971年就被关押审查，但到了1979年才开除其职务），但实际的权力格局中间已经不包括造反派的政治代表性。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反复号召“**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针对的现实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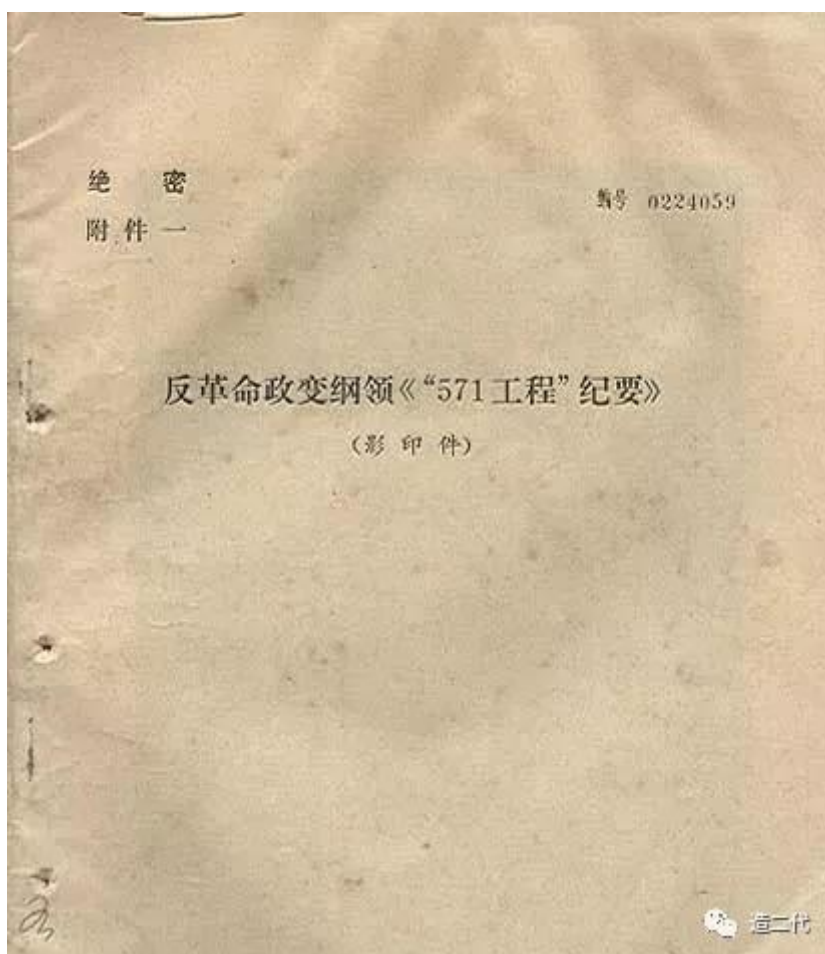
革委会成立之后，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专干分裂和阴谋诡计那一类事情，结果是1968年确立的革委会体制，在那伙人主导下演化成为较为纯粹的军事管制了，从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看，这伙人在变革完各级革委会之后已经接近于要搞“枪指挥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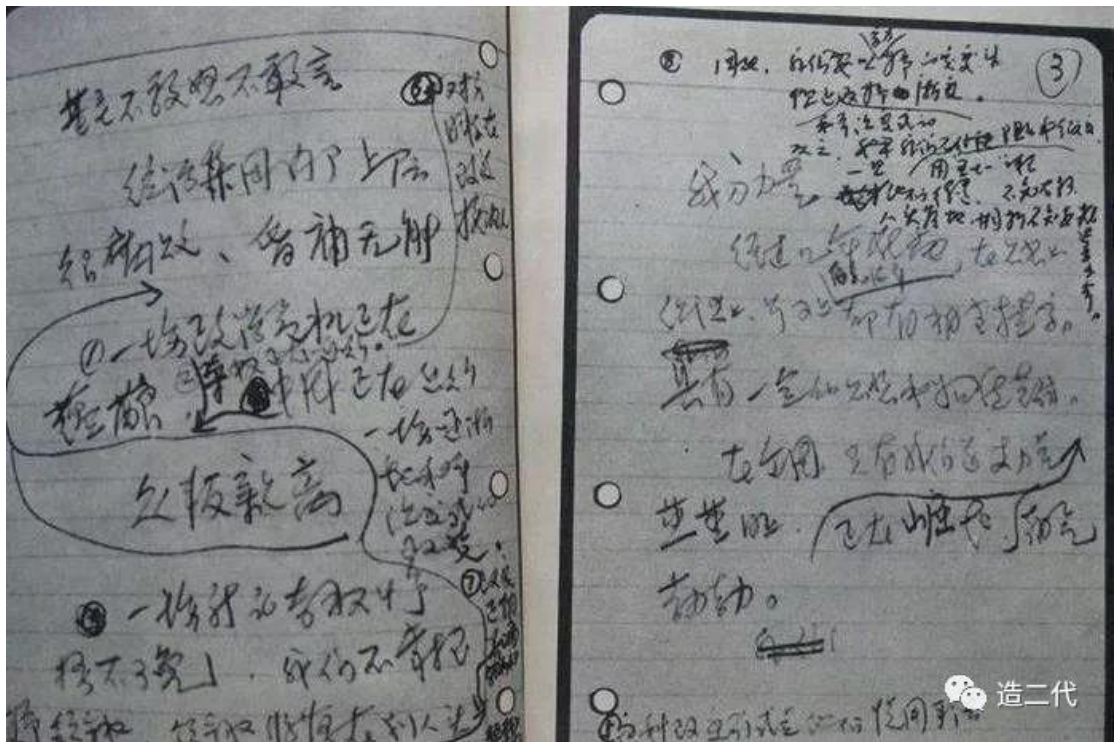
## 7、官场怨气与“五七一投机收益”

1968年革委会成立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对文革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官场对于文革的不满和怨气，造反派虽然也怀有强烈不满但未得到多少机会表达并产生实际影响。恰好，在革委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军队高官们在林彪集团把控的军委办事组的支持下，得以随心所欲地镇压造反派和

发泄自己的怨气。到了 1970 年庐山会议之后，在一股怨气驱使下的高官们的共同立场，检验出一个新的潜在投机收益——通过镇压造反派等文革派力量去满足官场情绪，从而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性。



在随后发现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文献中间，较为具体地剖析了奠基于文革博弈僵局的巨大政治投机收益——一个人如果能够满足官场对于文革的不满情绪，那么他就当然地获得代表官场多数的领导权，由此可以奠定毛后时代的政治领导地位。依据林立果等人的判断：“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一个社会中间总是有些人会感到不满意，由此隐含着政治方面的变革可能性和潜在政治利益，文革的特殊性是官场很多强有力的人物有了共同的不满，这一点许多人都能够看到，林立果等人也看到了——“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但是，要通过适当的投入去获得最后的产出，这是林立果所无法做到的，但后来其他具有各种优势条件的高官沿着这个努力方向成功了。



文革的主要特点是独立的造反派组织及其对于官场机会主义的批判，这遭遇到绝大多数当权派的憎恶和反抗，党政官员群体于 1966 年年底学生造反派组织占据优势时期选择罢工，结果导致第二指挥系统的重建和绝大多数官员丧失权力和地位，这个剥夺感的强化过程，加剧了当权派群体对于文革的憎恶和反抗，由此，形成一种官场共识和代表性生产机制——谁能够有效地体现官员们的意志和愿望，谁就能够获得官员多数的支持，并奠定毛后时代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份潜在的巨大政治利益，事关毛后时代的政治格局，姑且命名为“五七一投机收益”，1970 年代几次大的政治变动，都直接与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有着因果关系。

在文革博弈僵局形成过程中，当权派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策略：从当权派自身与造反派的博弈中间所产生的各种政治不兼容策略，这近似于消极策略；而通过镇压造反派和打压作为文革符号人物来迎合官场的多数意愿，建立自身在官场中间的代表性，则是追求“五七一投机收益”的积极策略。从 1970 年代的政治演进状况看，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的积极策略，先后有几波高官选择并实施过：

1970 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三位大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联手实施过；1974-1975 年是邓小平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胡耀邦、



万里、周荣鑫、张爱萍）实施过；1976年10月则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通过“粉碎四人帮”来实施的。



为了守护通过粉碎四人帮而获得的巨大投机收益，华国锋等人还是做了很多安排，不过没有奏效就是了。1977年把陈丕显调来湖北主政，为了获得陈丕显的支持，竟然支持他一个人把整个湖北省委整个的常委班子干掉，常委除了韩宁夫留用之外，其余省委书记和副书记统统调离，省委书记赵辛初调国家计委副主任，副书记宋侃夫调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副书记王克文、赵修、姜一调山西、吉林、陕西省任副省长。不过，陈丕显似乎认为华国锋不像最后胜利者，还是选择了支持邓小平。

谭启龙因为在浙江翻案，1976年被毛泽东处分赋闲之后，也一样被迅速启用去青海任第一书记，上头也一样支持他个人整倒整个省委班子，[参阅《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谭后来也没有选择支持华。

同时，派萧华去兰州军区整倒洗恒汉（军区司令员），洗恒汉只是没有积极附和胡乱平反的举措，并未明确反对给制造“青海二二三屠杀事件”的赵永夫平反，只是说这个案子原本是中央下文件定性的，由军区出面推翻中央文件在程序上不合道理，这样就被边缘化了；此外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撤换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有悖常理的过度支持，或者无节制换人，都服从于再分配权位以巩固五七一投机收益的需要，不过，结果都未能争取到贴心的支持者，最后投机收益易手的后果还是发生了。1973年开始，某元帅通过掌握军队的机

会，大量开后门照顾干部子弟参军，这也是在官场市恩买好的举措，任志强就是在这轮走后门过程中间参军的，[据任志强回忆，叶剑英安排的“走后门”参军，当时有相当大的规模，和他一起在济南军区参军的“官二代”，占据整个的新兵连队。参阅《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开后门”的受益者确实不算少，惜乎未能造成吸纳支持者维护新局面的结局。



在一定程度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之所以出现偏离会议主题并仓促地对许多文革重大事件采取颠覆性处置的方式，也肇源于文革“台下派”与“台上派”基于政治投机收益的竞争。胡耀邦等人策划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被吴冷西准确地解读为“向马克思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这样的狂悖举措被台下派视为重大威胁：这是某个高官群体试图以此造就垄断全部投机收益的最后策略，为此，他们也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去争取官场一些人的支持，这个基于投机收益再分配的恶性竞争，直接导致一些严重损害政权合法性的草率翻案选择（例如为在街头杀人的百万雄师翻案就导致武汉市民的极大反感）。此后再以法律、规则、公正和政治代表性论证合法性出现了困难，导致此后合法性论证只能够退守“三个有利于”了。

# 光明日报

GUANGMING RIBAO 1976年11月11日 星期四 第10000号

## 圆满结束友好访问离开朝鲜回国时 华主席给金主席的感谢信

朝鲜半岛局势复杂，中朝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金日成主席此次友好访问，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华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向金主席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将随着两国领导人的友好访问而更加广泛和深入。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将随着两国领导人的友好访问而更加广泛和深入。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将随着两国领导人的友好访问而更加广泛和深入。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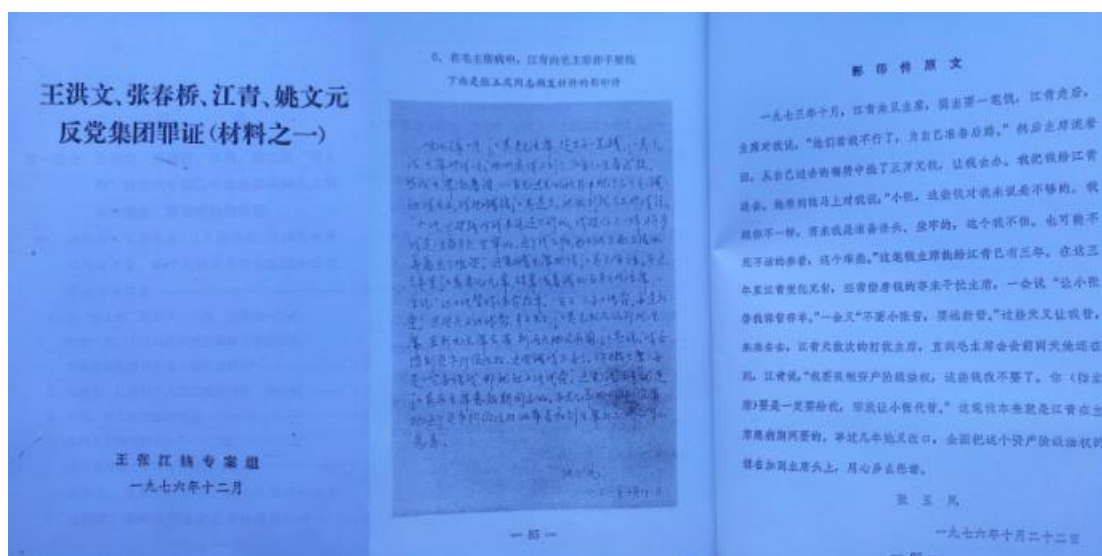
因此，理解革委会成立、大规模群众运动终止之后的文革走向，需要考虑文革两派共同塑造的博弈僵局的实际存在，也要考虑处置僵局的军队干部自身的“管理成本厌恶型”特点，还需要引入当权派群体对于文革的憎恶态度以及由此所隐含的“五七一投机收益”，这几个重要因素是很多重要趋势和事件背后的动力所在。正是因为遮蔽对“五七一投机收益”的竞争性追逐行为，官方文革史和1970年代的党史写作，是在甩开了最重要的解释因子之后完成的，由此，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就充满着巨大的随意性。



## 8、“五七一投机收益”争夺预示着毛后时代的政治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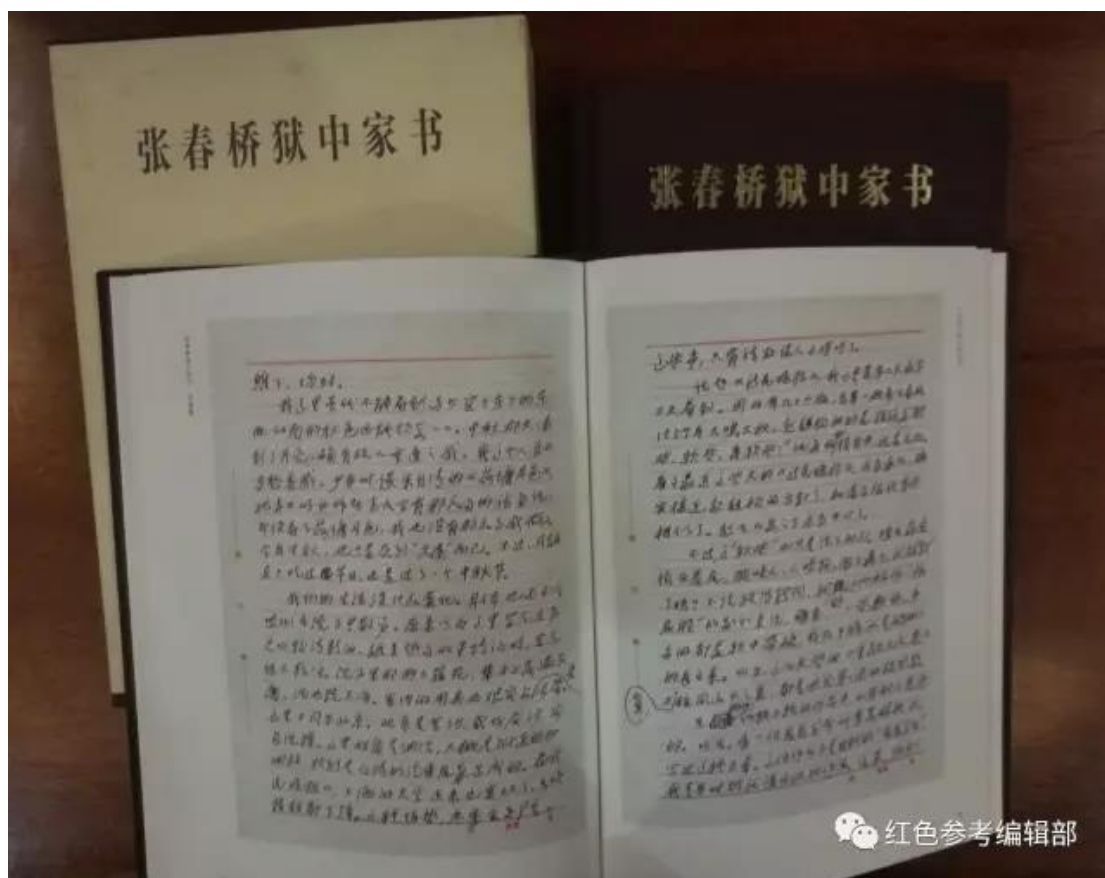
如果说造反派组织起来对于当权派及其机会主义的批判，可以称之为“群众造反”的话，那么，官场多数基于憎恶群众批判和权位剥夺而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则预示着与“五七一投机收益”争夺相关的根本性政治变革，这意味着会有一场标准的“贵族造反”。

对于贵族造反的潜在能量和趋势的认识，作为文革象征的符号人物，张春桥和江青等人对此心知肚明，早已经有了“当烈士”的心理准备。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之后，就已经被官场视为异己力量“必欲去之而后快”，不仅在上海市委当权派逃离市委家属院时期被丢下不管，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安亭事件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江青在1973年就与张玉凤说过，自己的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将来砍头坐牢，这个我不怕；二是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点。也就是说，因为支持过群众造反事业，张春桥和江青都明确认识到自己成为整个官场的对立面了。



对于自己早已经成为官场公敌，张春桥对此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女儿张维维的说法是可信的：“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师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1976年还对女儿讲“别人说要对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

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更早在1967年7月，张春桥与南京两派头头谈话时，就讲过：“要是刘、邓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时要一起杀，曾邦元、文凤来一起杀，你们在座各位也要杀，哪能这一派要杀，那一派不要杀，当然那时可能有人会投降，但是有的就是投降他也不要，因为你们两派是造他反的呀！他对造反派就那么宽大吗？如果你们是坚定的造反派的话，怎么能不想这些敌人呢？当然他们上台，首先中央文革是要杀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你们这两派呢？监狱在等着你们。我们就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复辟，就是要想这个问题。”



在毛后时代的党史写作中间，为了突出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正面形象，把四人帮写成各种蛮横的形象，这只是一种衬托新主角出场的文学描写手法，并不符合实际，更有悖于真实历史背景中间的力量对比。在1969年5月1日，张春桥讲了一句话“武汉反复旧不对，搞复旧也不对嘛。”就被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大骂“有的人把手伸到武汉来了，我要斩断他的黑手。”1970年上海血防会议时张春桥重复过这句话，曾思玉和刘丰还为此联名向中央写过控告信。应该如实地说，张春桥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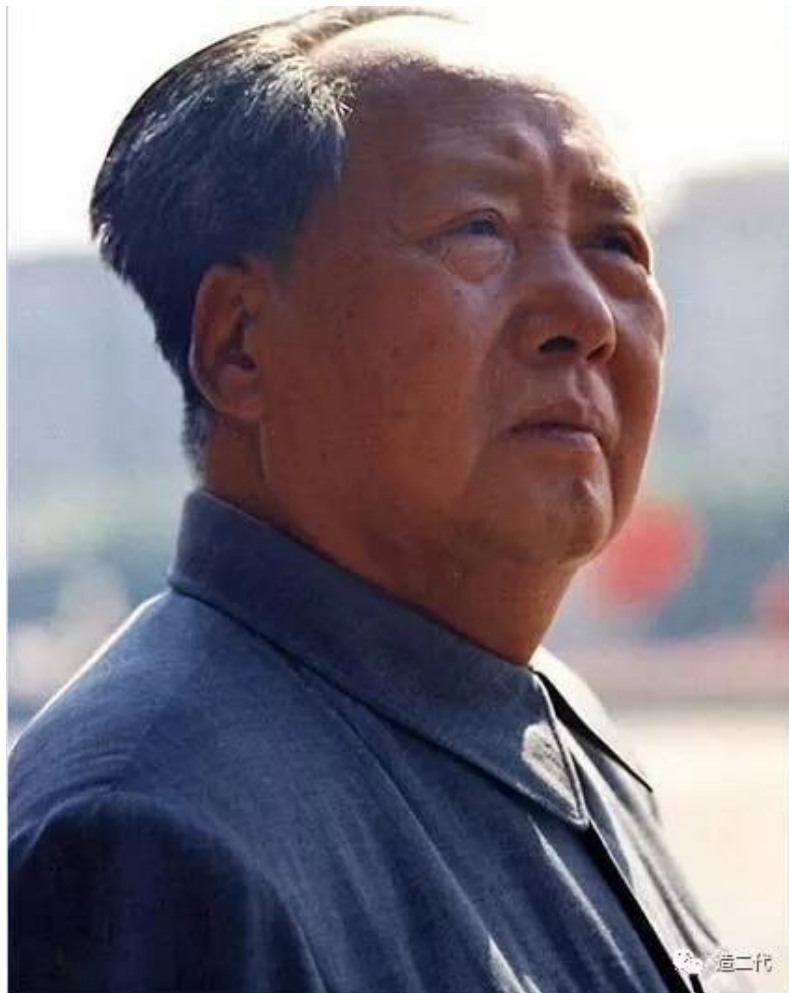
确有反对当权派无节制地镇压造反派的言论，但他的看法和批评意见，对于各地占主导的军队干部影响甚小。

在 1970 年庐山会议上，张春桥亲自感受到了整个官场对于他的怨气，很受震动。会后对上海市委打招呼说：以后上海要稳着一点，让辽宁去出头。也就是说，被官场针对的张春桥等人，实际上在官场内部说话很难起作用，除了威信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立场与多数官员对立，所说难于奏效，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整个官场视张如同寇仇。1975 年邓小平主政之后，据邓力群回忆，不是四人帮在进攻，而是邓小平特意成立了国务院政研室，预备以此为基础去夺取四人帮分工管辖的舆论宣传权力，据邓力群所说邓小平要夺四人帮的权力是绝对必须的：“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进一步的斗争，这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所以，到 1975 年 6 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简而言之，邓小平手里掌握一个能够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能够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班子，是把整顿继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

1974 年年底开始，毛泽东眼睛白内障严重，一度失去视力，直到 1975 年 7 月 23 日由唐由之主刀做手术后，才恢复部分视力。在毛泽东丧失视力期间，主要是由业已投靠邓小平一方的王海蓉和唐闻生两人负责向毛泽东通报信息，依据此种有选择的信息毛泽东只能够对现实做出很少的不准确干预。据程中原等人的研究，1975 年毛泽东所做的文艺批示（后来被解读为批判四人帮的文艺政策），主要是依据邓小平等人私下里找人写信或者送材料给毛泽东而做出的，毛泽东对文艺政策的批评，是依据邓小平等人选择的信息而做出的。

1970 年代较为准确的背景是：官场的力量对比不利于文革派，而文革派也居于收敛态势，处于进攻位置的是邓小平等人，1974 年夏天查出毛泽东活不过两年之后，尤其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相对明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的不可避免了，毕竟，民众大多数不觉悟，而官场近乎一致地反对文革并且形成了共识和一致。如果

不是邓小平过分张狂地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或许会延续 1973 年邓小平再次出山之后的安排，实现和平过渡。此后毛泽东选择一个既没有军方背景，也没有深厚资历和威望的华国锋作为接班人，似乎并非为了身后政局平稳过渡，而是为了实现与邓小平划清界限（1965 年毛泽东就说过“你们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经历了华国锋的过渡之后，邓小平不再有堂堂正正的接班人身份，回到权力中心就不再是光明正大地回来，而是走后门回来了。如果这个结果是可以事先就预料到的话，显然是毛泽东“挖坑”坑邓小平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对邓小平怀有初始好感的知识精英中间，邓小平也很短时间内就耗竭了自己的合法性光环，1989 年就已经从正面形象转为负面形象了。这不能说与毛泽东挖坑“坑人”毫无关系。



## 9、毛泽东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干预了文革？

从这个简单的文革过程回顾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领导下的文革小组，对于造反派的政策调节相对有效，无论是1966年支持造反派组织的壮大和崛起，还是1968年开始出台各种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号，都取得了效果，后一个抑制政策信号还被各地掌权的军队干部放大执行了。当然，对于造反派的政策引导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这主要体现在造反派群体往往持有明确而坚定的对政治异化的批判意识，政策要求造反派要对当权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和团结保守派，这恰好是造反派的批判意识锋芒所指的两大群体，造反派大多数对此未曾接受，很多造反派至今依然不接受这两个方面的政策，甚至认为毛泽东是对老官僚恋恋不舍、和稀泥；因为1968年出面弹压造反派多是周恩来出面，甚至还有人据此认为周恩来是与“新文革”有着深刻矛盾的“旧政府”代表。



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左起）陈云、邓子恢、朱德、贺龙、叶剑英、徐向前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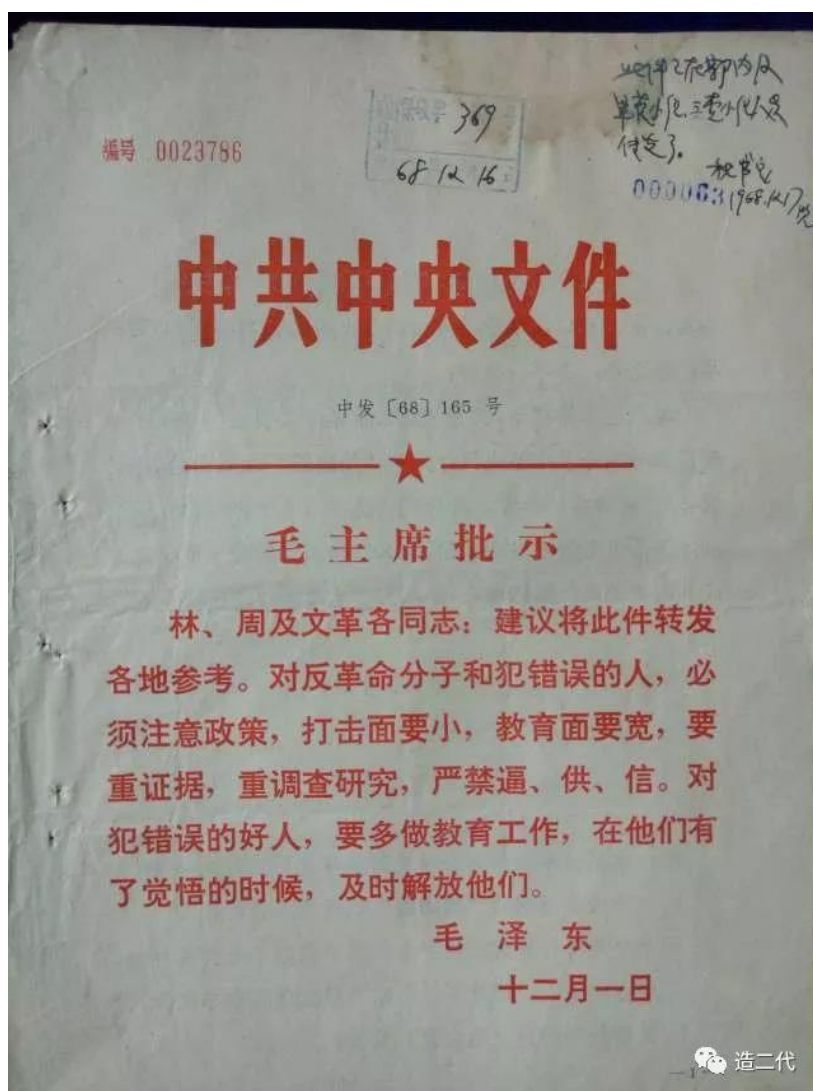
观察文革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干预当权派的各种政策要求，基本上未被接受。全国只有一个省委书记——河南的刘建勋——在 1966 年根据中央要求出面表态支持造反派的批判活动。在 1967 年决策“军队支左”后，各地军官基本上都不是“支左”而是“支保”，还往往把造反派看做反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在 1968 年革委会成立之后，中央政策要求对两派“一碗水端平”，除了安徽和陕西之外，大多数省区都是支持保守派去镇压造反派的，结果既损害到革委会的稳定性，也把造反派推到极端的对立面，使得他们始终持有一种坚决反对和批判当权派的强硬态度。这导致革委会的不稳定和缺乏工作权威，这又往往需要由中央出面召开会议做思想工作来协调，而周恩来往往就不得不出面主持这样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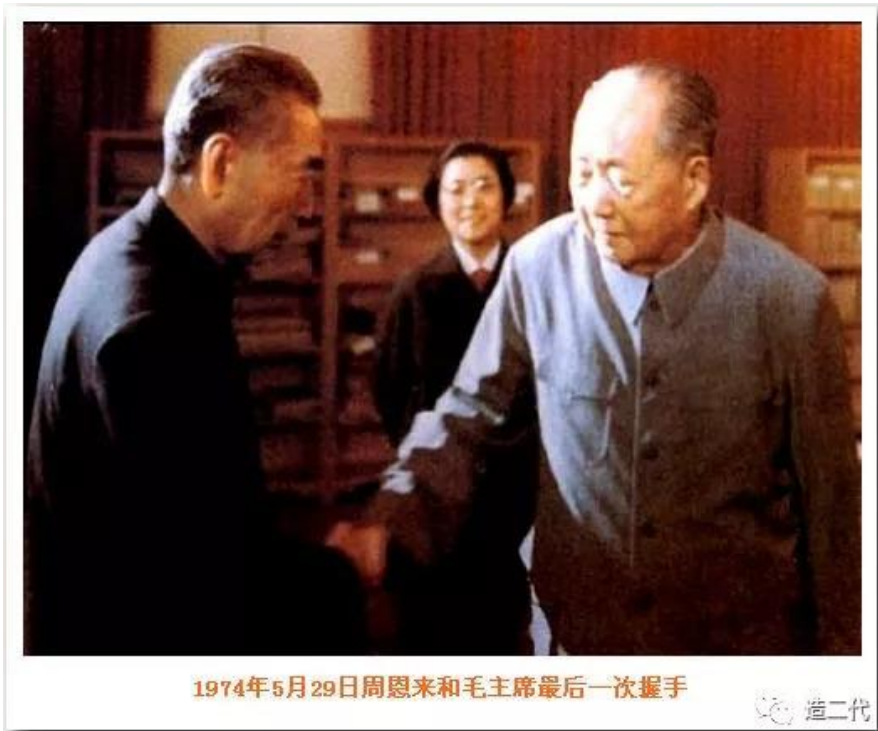
在 1970 年庐山会议之后，官场高层之间出现了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的各种竞争性的高官组合，后来出来至少三波追逐投机政治利益的浪潮，这不仅直接决定了文革的结局，还成为官方文革史写作的要点——遮蔽这一部分内容还成为今天官方文革史的政治任务。应该说，对五七一投机收益的追逐是完全自主的利益导向行为，已经使得政策调节完全无效了。

也就是说，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于强势群体的各种政策调节与引导，都是失败的，中央政策想要让当权派干什么，百分九十九的情况下是不奏

效的。文革期间对于当权派的打击，仅仅在剥夺多数当权派权力地位方面产生过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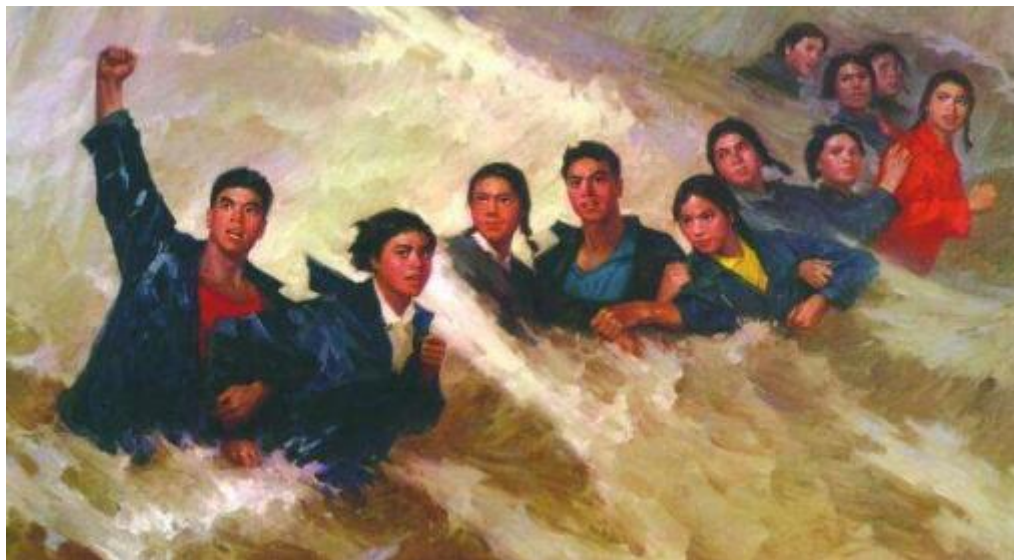
如果周恩来不是与毛泽东一样，站在多数当权派的对立面，试图对他们的派性和追逐投机收益的行为有所遏止，就不会被累垮了。如果周恩来是如同文革后官方所说，站在反对文革的立场上，那他肯定会比邓小平更轻松——可以一边玩桥牌一边当总理的，也不会比林彪集团的几位大将活得累。累还是不累，是由个人与官场潮流大方向的关系来决定的，顺着潮流走肯定不会累，要逆着潮流做一些挽回工作，哪怕是很少的挽回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以此而论，官方文革史写作中间，把毛泽东作为解释文革史的主要动力，说文革是领导人错误发动、反动集团利用的界定，是没有史实依据的。就参加文革的主要群体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政治博弈而言，采取何种方式参与文革，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反党集团决定的，而是基于自身的体验和选择。其中**决定文革进程的主要力量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和保守派**，恰好，这两部分人的行为和策略，都是对立于毛泽东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自主选择。



## 二、文革博弈僵局的形成与向右破局的占优选择——当权派对造反派系列镇压过程



从武汉文革的进程看，民间始终存在着强大的文革反对派力量，是一个显著特点。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批判，在各个时期和阶段，都遭遇当权派假手保守派实施的镇压，也就是说，反文革派力量对于造反派的镇压过程，是贯穿文革十年的主要特点。造反派领袖吴焱金在四十年后回顾说：走资派在文革期间的两大主要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

以具体的造反派个人为例，可以看到造反派对立面极其强大，是反文革派在为造反派塑造其曲折的命运。武汉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二号头头胡厚民，在1967年3月17日晚上被武汉军区下令逮捕，关押至7月19日，毛泽东面见陈再道时当面对其下令，指名要求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才得以出狱。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结合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入他所在单位后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逃出来之后去山东取经，后回汉发动“反复旧运动”（1969年4-5月）；1970年在“中央学习班”被作为重点批判，随后再次被关押审查，至1974年3月“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才得以释放，随后被安排结合进湖北省总工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被保守派捆绑游街，并由

保守派执行“群众专政”关押审查至1977年年底。胡耀邦担任“两案领导小组”组长之后，转交公安局关押审查至1983年，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0年刑满前夕死于狱中（1967年和1970-1974年被关押期间均折抵刑期）。胡厚民在文革前是一个优秀的先进工人，还是预备党员，在文革期间参与组织造反派组织并成为领导人，没有任何个人错误或者罪行。

胡耀邦时期专司审查造反派头头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贾处长说过，武汉的造反派是相当纯的，审查造反派是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生活方式问题一路审查下来的，当然也少不了历史和家庭出身问题审查。确实武汉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当中，党员多、劳模多成为一个共同特点。四人帮垮台后，赵辛初有一次讲话提到，武汉的造反派与四人帮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在思想上受的影响比我们要深一些。

从造反派所遭遇到的镇压性质看，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和内容：第一个阶段是习惯性镇压；第二个阶段是报复性镇压；第三个阶段是投机性镇压。在这三个阶段的镇压中间，可以检验出反文革派力量强大和对文革进程的主导作用，以及他们在文革各阶段的策略选择。

## **1、当权派的习惯性镇压**

文革期间造反派所遭遇到的镇压，第一个阶段是习惯性镇压——当权派习惯于把一切对自己的批评意见都看作反党右派或者反革命，不加思索地把自己看作是党和政府的化身，对一切质疑自己的声音，都倾向于选择镇压手段进行处置。

在1966年5-8月份之间，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派出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以反右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在教师和学生中间搞“分类排队、划分左右派”，同时依据北京刘少奇、李雪峰等人创造的“反干扰”经验，集中打击对此一做法提出批评意见的学生和教师。这个时期属于习惯性镇压阶段。

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评，往往只是针对其个人的私利和公权力私用和滥用，但是，当权派却往往把这一类批评视为对共产党政权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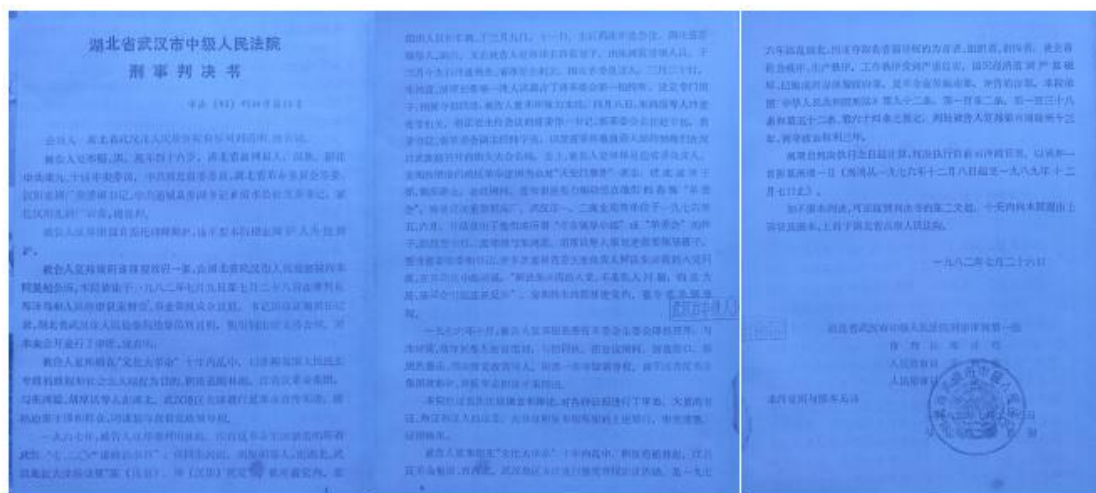
或者颠覆，视为对政府的颠覆。在这种思路的背后，是一种把当权派个人私利与公权力象征进行全面捆绑的“社鼠策略”。

《韩非子》中间记载了一段对话，说到官员作为代理人与权力所要求的公共性之间的诡异关系，两者之间很难进行彻底切割：“故桓公问管仲曰：‘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害。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在社鼠策略的反面，造反派进行简单的颠倒，把当权派自身与一切有关公权力的象征都进行切割，这就是通称的“扣帽子”——往往把当权派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反分子”，或者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这样，从当权派的社鼠策略出发，造反派以切割策略加以回应，结果出现了在批评权的不同策略博弈中间，都出现了以“个人崇拜”所表现的话语对立。当权派和保守派往往强调自己的“红”，来反对造反派的批评权，反过来，造反派则把当权派及其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与“红”的象征进行彻底切割，然后就说批判对象那些当权派是“黑帮分子”。

1966年9月湖北省委借陶铸之口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差不多的时候，陈毅在回答造反派质问时说：有人说张彦背后有大鬼，张彦背后就是我，我的背后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11月举行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副总理谷牧说“十七年来工交战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些把自己与毛泽东相互捆绑的策略，目的是为了反对造反派的批评权。反过来，造反派给湖北省委书记（文革初期以及调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则是针对性的策略，这一策略是对“社鼠策略”的简单颠倒。在群众的相互辩论中间，清华四一四派提出的“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也一样从属于社鼠策略，目的在于反对团派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批评权。

在镇压造反派规模最大的“批清运动”中间，通常是把造反派说成一贯主张“三反对”（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对人民解放军）“三重建”（重建党、重建政府、重建军队）。这与上述社鼠策略一样，也是把自己与党、无产阶级司令部、政权和军队这些象征，彻底捆绑在一起，有且只有这样，在遭遇到批评意见的时候，就可以毫无逻辑过渡地把批评者说成是反革命。



工人劳模夏邦银，文革期间参与“工人总部”组织，还参加过批评当权派的造反活动；选为九大和十大的中央委员，1982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被判刑十三年。

“社鼠策略”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1981年之后正式的法庭庭审中间，这个策略的内在逻辑依然被看做完全有效而得到广泛应用。成都工人造反派邓新国（三结合时期是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审判庭上被诉篡党夺权，邓一拍桌子说：我的革委会副主任是毛主席批准的，你法官的官帽子是怎么弄来的？

## 2、对造反派的报复性镇压

文革作为毛泽东所说的一场认真的演习，演习参与的各方都获得出场机会，并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进行表现，这是文革的主要特点，1967年年初参加支左工作的老军头也一样。

在1967年一月底依据“军委八条命令”开始执行“军队支左”任务之后，军队干部开始深度接入到文革中间来了，他们也按照自己的选择去选择阵线和策略，结果出现一个自上而下的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来称之为“二月逆流”，也有些地方军队镇压造反派是

三月份实施，这股潮流也有称之为“三月镇反”的。这个时期，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的造反派及其组织，作为反革命对待，军队发布命令解散造反派组织并抓捕造反派领袖。这个时期的镇压，是报复性镇压阶段的第一个议程。

很多老军头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运动并镇压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原因。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在检讨中间有一个很具体的自我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支左之后，大多数老军头都是“支保吃左”。陈再道说他这么选择的实际理由是：“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要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



据武汉军区子弟老李回忆：军区文革初群众起来之后，陈再道、孔庆德和叶明的大字报比较多，叶明是因为分管文革很多群众抱怨他不支持革命，孔庆德是因为分管作战事务与罗瑞卿的“大比武”单纯军事观点有关系，而陈再道则主要集中在男女作风问题上。一月底军队支左之后，先是在军内把造反派抓起来，然后才到地方抓人的。由于各地军头们都选择镇压造反派，很快中央就在1967年4月6日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各地解散造反派组织并抓捕其领袖的政策缺口被堵塞了，由此开始了镇压形式的改变。武汉组织了以各单位“武装基干民兵”为成员的“红武兵”，以这个组织为核心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然后开始以武斗方式围剿造反派组织驻地和宣传据点，官方文献承认在1967年6月的武斗中间，杀死造反派一百多人，杀伤数千人。这是报复性镇压的第二个议程。军队不能够直接抓人之后，就策划和支持“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以此去对付造反派。

不仅陈再道如此，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军内开展四大和群众运动之后，很多高级军官都受到群众运动的强烈批判，空军的吴法宪、总后的邱会作莫不如此。空政文工团的刘小姐去找叶群哭诉：说她们几个保吴法宪的人是少数，无法回单位，一回去就被骂做“保皇狗”。不仅在单位内部极其孤立，就算是在外面刷一下存在感，由于人少都搞不成。最后是叶群帮助出主意：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的保守派一同演出，叶群再拉林彪到现场观看以示支持。结果，1967年5月13日军内保守派“刷存在感”的演出，被多数造反派给冲了。1967年上半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日子都很难过，各人在本单位都有很大的民愤，受到多数人的批判，直到五一三事件之后，叶群林彪直接介入支持拥护他们的保守派，他们的日子才好过起来。五一三演出未能成功，后来两派都在七一这天安排了演出，林彪只观看了军内保守派的演出，此后，军内造反派逐步走下坡路，叶群因此得意地说“解决军内那么大的乱局，首长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由于军内高官们强大的反文革情绪，结果是全军文革小组无法稳定地开展工作，支持造反派批评权的萧华和徐向前，都被林彪撑腰的几位大将搞垮并边缘化了，同时军内造反派在 1967 年五一三事件之后逐步瓦解。720 事件之后，先成立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参加的看守小组，后来发展成为军委办事组，这个转变也是一次很重要的权力转移过程。丁凯文引用邱会作的回忆录，说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及其所代表的权力嬗替过程，其功能性作用是：“（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以后，部队的三军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也就应运而生，军委办事组是向全军文革夺回文化革命领导权的产物。”

当然，这个夺权之所以顺利实现，是因为党政当权派罢工之后，维护秩序的工作迫切需要军队的有组织力量起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稳定军队指挥系统有着高度必要性。毛泽东曾经批评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行为，说“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正是利用毛泽东对于现实的秩序担忧，林彪集团的大将们边缘化了全军文革小组，并实现了夺权。1968 年“三二四事件”之后，傅崇碧、杨成武和余立金三人倒台，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队权力更高程度地集中到了林彪集团手里，他们一伙把持了新成立的军委办事组，然后通过各级支左军队干部之手操持革委会的政策执行过程。这两次集权的背景很是诡异，第一次集权是在军内搞垮支持军内群众运动的徐向前和萧华，第二次集权是 1968 年的“三二四事件”，这个新的权力机构高度密集地配置了历史上同一个山头的老军头，同时他们在镇压文化大革命方面还有这高度的一致性，从事后这一伙人的作为分析：他们较为一致地野蛮镇压干部和群众，站在官场多数和群众多数的对立面。

上面是军委办事组，下面各级革委会也都是换上了军队干部，这就使得办事组操控全国局势的能力，大为上升。到了 1968 年 9 月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地方革委会中间也是军队干部占据主导地位，“全国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 78%，广东省占 81%，辽宁省占 84%，山西省占 95%，云南省占 97%，湖北省占 98%。‘支

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约有 5000 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 5 万人。”

此后，中央层次是军委办事组，下面是对文革持有强烈报复心理的军头们在各级把持革委会，后续文革局势和革委会内部的演变状况，就是这一拨人在那里实际起到决定作用。1968 年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其中造反派代表名额约占 40%左右；而先行成立的各单位的基层革委会中间，造反派代表占据了更大的份额。1968 年夏秋季，派出了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各个基层单位，在最初阶段还是执行消弭派性促进联合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工宣队和军宣队就改为镇压造反派为主了，相应地，军宣队和工宣队成员也进行了换血——工宣队大量改为保守派成员担任，由此开启了对造反派更为系统的镇压过程。在镇压的最初阶段，是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以军宣队和工宣队为主体去代表革委会的职能并夺取革委会的权力，把造反派为主体的革委会作为“马蜂窝”捅掉，把近乎全部的造反派革委会成员作为所谓的“马蜂王”捉拿起来，当做反革命进行审查。然后，结合“清理阶段队伍”和“一打三反”等政策，对造反派进行更为严厉和彻底的镇压。

到了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后，全国造反派在“批清运动”中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超过 1000 万人，近乎全部造反派头头与骨干，被扫地以尽。经过“批清运动”之后，所有造反派得罪过当权派的“罪行”都已经得到过度清算，报复性镇压阶段就此结束。

### **3、革委会的组成成分变化**

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提到一个政治策略“打着 B52 的旗号镇压 B52 的力量”（B52 是指毛泽东），现在看一下某些把林彪包装成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人士，是如何阐释这一策略的。据丁凯文的说法，林彪集团在政治上很正确，是反对文革和文革派力量的英雄，先夺取军队内部的文革指挥权，然后借助军官们对于各地革委会的影响，撤换与造反派合作的亮相干部，在革委会内部换上具有鲜明反文革态度的官员。具体表现在：“（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以后，部队的三军革命

派打垮了造反派，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也就应运而生，军委办事组是向全军文革夺回文化革命领导权的产物。”“坚决支持军队系统干部，使之成为对抗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重要力量。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在文革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度躲进大别山，甚至声称要武力对抗造反派。军委办事组就是看重许世友这一点，对许世友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通过组织手段，将造反起家或支持造反派的重要人物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文革之初最早起来造反夺权的有四个省：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和黑龙江省。主要代表人物是山西省的刘格平、山东省的王效禹、贵州省的李再含、黑龙江省的潘复生。但是到了中共九大时，军委办事组的力量进入中央政治局，这几个最早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都被换下，军队的领导人成为这几个省的第一把手。北京军区副司令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汪家道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等于变相地让这些因造反起家的代表人物边缘化，不再主持省委主要工作。用邱会作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三支两军’。’”

1972年已经就结束军队支左对下征求意见，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对调之后军队支左彻底结束。此后，各地成立的省市委又由文革前的党政当权派主导，此时，对于文革清算不仅针对造反派及其骨干，还一样波及到较早亮相并结合进革委会的当权派。其中浙江的表现最为典型，谭启龙调入浙江主政之后，陈伟达虽然并未担负组织方面的工作，但他向谭启龙献策，把早期亮相干部在各级党委中间排位靠后并架空，说这一批参加革委会早期结合的干部，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间犯了错误，绝不让其接触组织、公安和宣传等关键权力。湖北和武汉比较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如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和薛朴若(市革委会副主任)，也一样很早都被隔离审查。

#### **4、博弈僵局的形成与选择向右破局的两个条件**

就造反派而言，在文革前期形成的不妥协的批判意识在今天继续有效；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来说造反派的批判和因政权重组激起了强烈的受剥夺感受，构成了他们对于造反派和文革新秩序的不兼容心理，双方共同构成了对秩序再造的威胁能量。由此，构成了那种双方互不妥协的“博弈僵局”：在造反派看来放弃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对于政治异化责任的追究就是“背叛革命目标”和“复旧”，在当权派和保守派看来，剥夺他们的权力地位以及根本性修改政治积极分子的选拔标准，就是背弃常规，这两种认识会自动地创造和叠加各种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使得互不兼容程度逐步上升而难于调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博弈僵局。

在博弈僵局的背后，是派性的能量在起到推动作用。就文革的经验看，派性的主要政治特点是不兼容对立面的正当权益，倾向于以垄断和强势压倒对方的策略选择，去简单地解决冲突。大体而言，当权派和保守派对于造反派的不兼容程度较高，而造反派从认识上不兼容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异化追求，但在行动上还大体接受中央政策的调节。也就是说，反文革派的派性和不妥协，成为革委会成立之后的首要问题，结果导致革委会的不稳定和难于有效工作。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之下，展开了许多次解决各省问题的马拉松会议，去艰难地协调革委会内部的不兼容状态。

对于在地方主政的高官而言，成立革委会主要是由军队干部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协调博弈僵局的管理成本，高于绝大多数军队官员愿意承担的最高限度，因此，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那样简单地选择“一派敲掉一派”的策略，是更为常见的选择。而真正按照政策要求实行“支左不支派”“一碗水端平”的军官，目前所知只有安徽的李德生(12军军长，调入安徽支左，后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和山西的胡炜(21军长，调入陕西支左，后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两人大体上按照中央政策要求，选择做艰难的两派协调工作，没有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保守派然后合伙镇压造反派。据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顾凤鸣的回忆，革委会开会讨论各种事情的解决方案，两派都同意的基本

没有，一派坚决反对另一派坚决支持的绝对行不通，只有寻找那种一派支持另一派不那么反对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说服工作做起来十分困难，很多时候革委会讨论问题需要彻夜开会，他经常在会场上睡过去了。

一位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回忆，军队干部多数简单粗暴，习惯于令行禁止，不太愿意做说服工作，你要是老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多数人直接选择抓人，很少会选择跟你耐心讲道理。在革委会成立之后，革委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高级军官，这群人比较党政干部群体，更加不愿意做繁难的思想工作和说服教育，而革委会成立之后又恰好是他们处在一个难于协调的博弈僵局中间，结果导致了对造反派后续的过度镇压，更何况，相当一批军队高官并没有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中间取中间态度，而是带有强烈的反对造反派情绪去处理问题的。

有两个特定的时势，有利于那些怀有镇压造反派野望的高官们，1967年年初军队支左决策的做出，当时的背景就是党政当权派群体选择消极对抗策略转入实际上的罢工，第二指挥系统重建过程中，军队高官占据主导地位的不二选择由此确立，大多数军队高官对于文革的反感超过党政当权派，军队干部掌握革委会的主动权，是选择向右破局的最大支撑。同时，1967-1968年两年国民经济下降，恢复秩序和生产的压力很大，为此，从1968年夏天之后，周恩来出面召开国防冶金工作会议，把生产恢复视为第一等大事，为此出台了各种抑制造反派的信号，这无疑鼓励各地当权派据此去开辟出更大的自主镇压空间。因此，文革博弈僵局选择向右破局的两大起点是：一是1967年军队支左后新成立的第二指挥系统中间军队干部占优势和主导，第二是到了1968年夏天之后为恢复生产出台了很多抑制造反派的信号，这被各地反文革的当权派放大执行。

从1968年夏天开始，各种抑制造反派的信号集中出台，其中较为主要的信号有以下几项：1968年7月中旬，各地具有不满意识的造反派头头，在北航聚会，这个会议后来被周恩来和康生定性为“北航黑会”，把造反派对于革委会的不满和批判意识，视为对秩序的潜在威胁

加以批评和抑制。此后，经过毛泽东“七二七接见五大领袖”的讲话，随后向北大和清华派出了工宣队；周恩来主持的1968年八一五国防和冶金工作各次会议均弹压造反派；还包括“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核心内涵都是抑制造反派中间所隐藏的对革委会的不满意和对抗意识。一些地方官员利用这些政策信号，加大了对于造反派的镇压和抑制力度。

在湖北和武汉的革委会成立之后，1968年对学校 and 工厂等基层单位派出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最初阶段还是按照政策要求，做过一些弥合派性冲突的工作。很短时间内，军宣队和工宣队就更换成了反对文革的保守派成员，这些军宣队和工宣队不仅架空并夺取了革委会的权力，还把革委会成员（大多数是造反派头头）管制起来办“五不准学习班”，后来遍及全国的“批清运动”（批判派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就是在军宣队和工宣队主持之下，以保守派成员作为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逼供信”动力，搜集口供或者捏造出各种假证据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湖北和武汉市通过假手保守派成员的逼供信，打出了“五一六”和“北决扬”反革命分子60余万人。就这样，全国军队干部主导下的革委会，通过下派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之手，联合最积极的保守派成员，通过逼供信制造虚假的“反革命案件”，联手完成了彻底镇压造反派的事业。此时，全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合计超过1000万人，造反派的骨干力量近乎被扫地以尽。

在造反派占据相当优势的基层革委会被颠覆，绝大多数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文革的残留意象只有政治局内部几个文革符号人物——例如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以及他们主管的宣传领域了。而1971年8月底的庐山会议，就是打算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清算，在毛泽东身前完成类似于“粉碎四人帮”那样的壮举，当然这个目的在当时没有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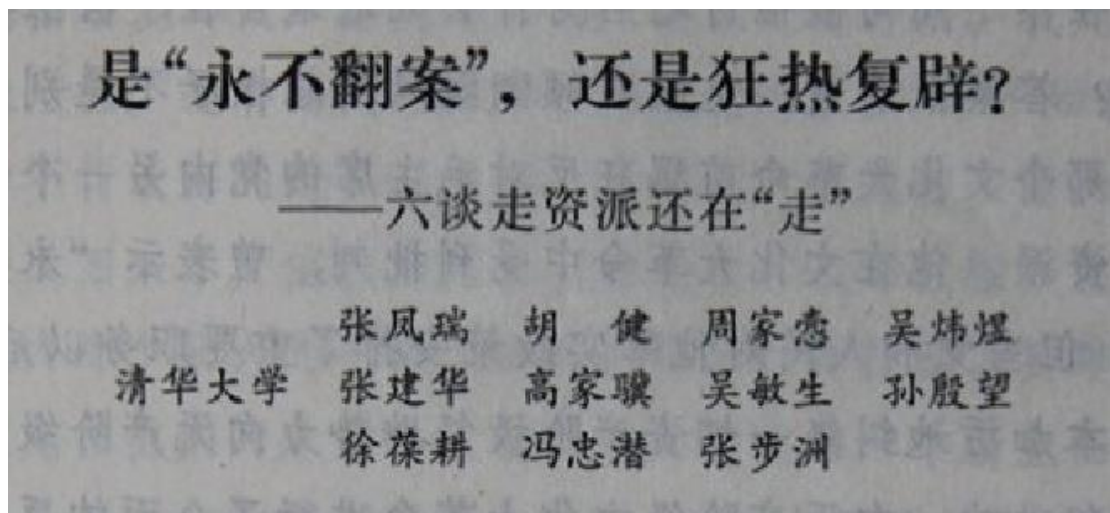
通过镇压造反派的力量而选择向右破局，有两个方面的现实条件：秩序担忧以及军队作为主导力量参与恢复和维护秩序，这是选择向右破

局的第一个条件，而 1968 年夏天密集出台的各项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号，被各地憎恶造反派的军队干部放大执行，这是向右破局的第二个重要条件。

## **5、右倾翻案风与投机性镇压**

1973 年邓小平出山，1974 年之后就和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张爱萍等“四大金刚”一起，先在口头上搞了一阵彻底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风”，到 1975 年就正式提出要“整顿软懒散的班子”——凡属镇压造反派不卖力的都要算作是“软懒散”，这相当于是采取组织手段给各省市施加压力，明确要求各级党委甩开政策和法律的条条框框，无视造反派的平反要求和压力，更加紧密地结合保守派群众，共同把镇压造反派的事业进行到底。

据周恩来联络员老李回忆：1974 年夏天成立过一个医疗组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一个天津的医生发现毛泽东罹患了运动神经元病，并指出这个病情是无解的，病人活不过两年。此后，邓小平和四大金刚的“右倾翻案风”就大规模开始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字报

上述大字报披露，邓小平“他不惜现身说法，要他们‘不怕打倒’，‘不怕抓辫子’，‘要突出一个敢字’。在现身说法、撑腰打气的同时，还进行了许多直接的点火和布置，比如，对周荣鑫说：‘现在



都不读书了，你这个教育部长还不去演说?’周荣鑫心领神会，于是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就接连不断地泛滥开来。”“教育界的周荣鑫宣布：对教育革命‘就是要扭’、‘不怕打倒’、‘看破红尘，无所谓了’。科技界的某领导人则说：‘说复旧就复旧，那是为了工作嘛!’某省的一个领导人叫嚷：‘你们不要怕当复辟派，要说复辟派，我就是复辟派。我是复辟派的后台。’还有的人对着革命群众连叫三声‘今不如昔’。有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上任就说‘我是还乡团队长，今天又回来了。’他们为什么胆那么壮、气那么粗?就是因为党内那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开打出了复辟的旗帜，充当他们的总后台。就是他公然对一个新上任的省委领导人说：‘你到那里要大胆干，工作上不要怕出乱子，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他还对另一些领导干部说：‘无非说你是还乡团嘛!搞复辟倒退嘛，他说他的嘛!不要怕嘛!’‘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吗?’这些赤裸裸的语言最明显不过地表明，这个自称‘永不翻案’的人，正是去年猖獗一时的翻案复辟活动的组织者、鼓吹者和指挥者。”【老田按：文中未指名的人士有：科技界领导人是指胡耀邦，对着群众高喊过“今不如昔”的有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新上任的省委领导人士指去云南任职第一书记的贾启允，不要怕说是还乡团这个话是邓小平对预备出任四川省第一书记的赵紫阳讲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台不久也就对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开了刀。他大讲：造反派中‘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争权夺利，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阴谋诡计、串连等，有了这种人不调出去，就搞不好建设’。又说什么造反派就是‘用派性压党’，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闹派性’，‘白专也比他们好’。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他说：‘青年干部提拔太快，效果不太理想’，‘今后提拔干部得矮子爬楼梯，一级一级地来’，对于现存的这类干部一律挂职下放‘到基层锻炼改造’，甚至说：‘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留着他们呢?’在他这样的号令和煽动下，许多地方、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青年干部成批地受到各种排挤、打击、镇压，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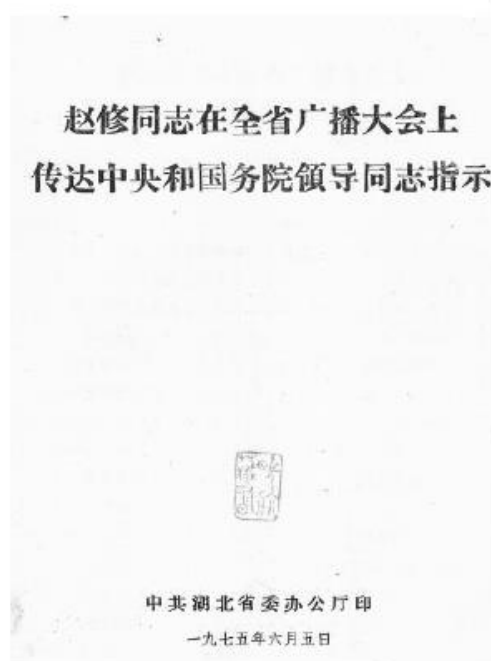
甚至被关进牢房，那里的安定团结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遭到破坏。”

在邓小平上台主政之前，最主要的文革演变过程是：各地军队干部破坏了革委会并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为实现此一目的，制造了涉及上千万人的冤假错案。

针对造反派的平反要求，邓小平和万里等人 1975 年年初选择徐州作为整顿试点，确立了“右倾翻案风”对于冤案的回应模式——采取更大的镇压力度去消弭平反要求。据邓小平自己承认的数字，徐州这么个小地方，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就有五六千人之多。万里秉承邓小平的旨意去徐州铁路进行整顿时，没有回应造反派头头的平反诉求，而是选择了抓捕要求平反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并继续判处其十年有期徒刑。早在铁路整顿之前，1月28日邓小平“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时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审定的一九七五年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九号文件迅速下发各地，还得到各地官员的过度执行。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在 1975 年 6 月 5 日在全省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中间，说出自己对九号文件的理解：“贯彻九号文件，‘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同资产阶级派性作坚决的斗争，迅速出现了安定团结、大上快上的大好局面。但是，从全省的情况来看，革命、生产仍然发展不快，表面上虽然比较平静了，实际上还存在不安定的因素。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省委对中央九号文件精神领会不深，抓得不集中，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不力，对资产阶级派性作坚决的斗争不够，一句话，太软了。”应该说，1975 年邓小平提出继续镇压造反派的的活动，不再具有挟嫌报复性质，而是积极地追求一种政治上的投机性收益，为此就迫切需要开展镇压扩大化的新运动。邓小平的这一次整顿，当然也不具有任何恢复秩

序或者生产的政策内涵，而是试图结合官场中间普遍的反文革情绪，去建立起自身的代表性和领导权的努力，是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的政治安排。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是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

第二，必须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

第三，落实政策问题。

从解决铁路问题，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也都说明落实政策这个问题很重要落实政策，特别是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我们说经验主义不好，可是把“主义”二字去掉，经验还是宝贵的，不能忽视。这些工人和干部摸到的经验是可贵的，要培养多少年才行啊！这些人的积极性不调动起来是不行的。今天我们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央这个批示时，也提出了这个意见，要注意落实那些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技术骨干、老劳模的政策，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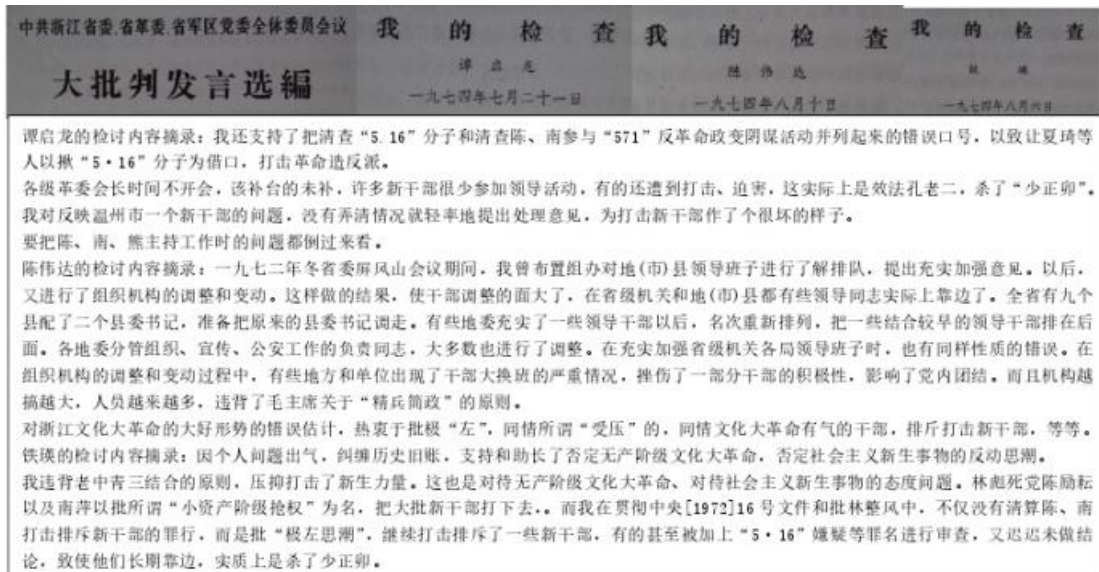
落实政策也是跟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

这是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赵修，依据邓小平的意图为执行“九号文件”所做讲话的部分内容。

1975年另外一个强有力的镇压造反派政策出台，是肇源于浙江的所谓“双突”问题。在官场中间，谭启龙可能是最先提出彻底否定文革想法的热，他1973年就在浙江公开地提出过“要把陈、南、熊主持工作时的的问题都倒过来看”。从1972年开始，浙江整饬造反派和“亮相干部”的力度极大，引发较大的冲突和不稳定。

由于浙江是周恩来选定的文革试点地区，浙江的状况是周恩来长期密切关注的，谭启龙等人的放肆行为，一年内受到周的几次批评，为此他不得不转弯子。于1974年在莫干山召开“三全会”（浙江省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杭州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和省军区全体委员会议），会上谭启龙、陈伟达和铁瑛做深刻检讨，会后开始落实政策，平反在镇压造反派时期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落实建党政策并一定程度上恢复革委会

中间的造反派席位，这在全国各省区中间都是较为突出的政策实践，这就是所谓浙江“双突”问题的由来。



据曾任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回忆，在解决浙江“双突”问题，是在邓小平 1975 年掌权之后，邓就此与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达成过一致：“中央确定浙江作为整党试点，由中组部、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工作组，赴浙江帮助省委进行整党。我派王英、袁木等几位同志参加。不久，邓小平同志约谈纪登奎同志，问他：浙江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同志回答说有两条：一是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暴露在社会上；二是要保谭启龙，不然又会层层揪领导干部。重点是解决几个造反派头头的问题。”为了向邓小平表示自己的积极态度，纪登奎不仅献计献策要在浙江把镇压造反派进行到底，还主动提出在自己的老窝子河南也率先开展反对“双突”，因为河南的老干部与造反派合作程度相对较高，前期镇压不够，所以也要搞镇压补课，为此，浙江与河南都选定为镇压不够的典型进行优先处理。据河南的老袁回忆，在 1975 年河南镇压补课，河南的造反派起来批判纪登奎，说他是投降派，据老袁了解，在解决浙江“双突”问题时，纪登奎给谭启龙出主意，以后给中央的报告不要写“中央并转主席”，按照规矩这样的报告要送达主席那里，会带来不确定性，直接抬头送中共中央，果然，解决浙江双突问题的报告按照中共中央抬头上达北京之后，纪登奎以中组部核心党组名义批准了浙江省委的报告。

这样，就把浙江作为“双突”问题严重的地区，派纪登奎等人去浙江督促解决，逆转了前期的政策，把平反冤假错案说成是“打开牢门找左派”，把落实党建政策和恢复革委会代表席位说成是“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然后把张永生拿下押送河北劳动改造，把翁森鹤隔离关押随后判刑直至2005年才假释出狱(假释考验期至2015年)。张永生在河北遵化县劳改时，被折磨到几近瘫痪，周建人(文革前是浙江省长，鲁迅弟弟)给毛主席写信反应了这些情况，毛泽东1976年有亲笔批示要给张永生落实政策。

郭玉峰回忆，当时邓小平和纪登奎预备把这个经验向全国推广，“7月17日，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转发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中央16号文件下发后，揭开了全国整党工作的序幕。不少单位即开始整党试点工作。”然后郭玉峰还根据纪登奎的意图，“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是思想整纯的重点。‘批林批孔’以来，各地帮派力量猖狂，拉山头，搞串连，违法乱纪，以派压党，派性高于一切。这次整党就是要消除派性，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恢复党的传统作风。第二，彻底纠正违反党章规定的‘双突’问题。文件明确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一年的实践考察，具备党员条件的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不具备条件的除名，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坚决清除出党；对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第三，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党性强，敢抓工作的领导干部进班子。”“遗憾的是，当我们正在根据纪登奎同志的意见修改这个整党文件时，形势就发生了急骤的变化。1975年11月，毛泽东批评刘冰写给他的一封信，开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河南洛阳轴承厂的整党试点尚未结束，就进行不下去了，中组部派的工作组也只好撤回。”应该说，郭玉峰紧跟纪登奎，当时是在竭力落实邓小平的意图，在镇压造反派方面唯恐落后的，但是到了1979年，却被胡耀邦硬指为“追随林彪、四人帮的主要帮凶”而撤职查办，这让他感受十分委屈。

## **6、反文革派对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

武汉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造反派针对 1969-1972 年前后的过火镇压，提出落实中央政策并平反冤假错案的要求。在最初阶段，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压力之下，倾向于有所让步，被关押 4 年的胡厚民在 3 月份被释放。胡厚民出狱之后，针对大量冤案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等五项要求。

与此同时，在 1974 年 3 月-1975 年 1 月，前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和张迪杰等人，曾经四次去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干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否定“两清一批”运动问题。主要的担心体现在一九七四年署名“汉阳地区一些共产党员和群众”的传单，传单题目为《给省市领导提几点意见》，其中的最为担心的是给造反派落实政策之后，会带来对保守派的不利影响：“各单位在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时，组织了不少骨干搞专案，内查外调，花费了很大人力和物力，现在全面一风吹，退换材料，赔礼道歉。事实上这些被调查的人，早已知道是哪些人调查了他的材料，哪些人在背后提了他的意见，哪些人写了他的材料，所以这些人对于专案组骨干，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此，不仅没有消除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原油的隔阂，而是旧恨加新仇，更加仇恨对立面的广大群众！……象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你们省里好表态，市里好表态，各单位军代表好表态，但是，一个单位的工人，朝夕相处，以后的隔阂怎样消除呢？这个问题市里领导是否有所考虑呢？”

在文革的背景下，冤案受害方提出平反要求，毫不奇怪，制造冤案的参与者有着截然相反的诉求，两种截然相反的诉求，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取舍，邓小平是有着鲜明态度的：邓小平小平想要代表或者保护的“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党团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这在现实中间对应着文革期间参与制造冤案的那些保守派，要是给造反派平反昭雪了，造反派不是坏人，那把别人打成反革命的人肯定就是坏人了。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之后，造反派组织起来要求平反冤案落实政策，遍及全国各地，在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一些地方包括湖北省有一些平反冤案的政策措施出台。1975 年九号文件下达之后，省市委

的态度急剧转变，不仅停止平反还继续加大镇压力度，造反派拒不接受，继续在街头抗议。为此，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与市委书记赵辛初去北京面见中央领导(估计是邓小平或者李先念)，领导给了30个抓人指标，回汉后在1975年2月抓捕了30人进监狱。这才把造反派的抗议活动，给强制平息下来。

在抓人之前，湖北市委和武汉市委的“两赵一王”(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赵修，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是倾向于部分回应造反派的要求的，不仅在省委招待所安排造反派头头开会见面协商问题，还对造反派的落实政策有所考虑。据王克文回忆录《丹心照玉宇》披露，1974年毛泽东在官场内部发起“三大讲运动”——要求干部公开讲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求高级干部做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群众，他本人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带头做了检讨，还引导很多干部去做到正确对待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导致与造反派形成后更多合作与妥协。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达下来之后，官场形势大变，到了文革之后王克文再一次转过头去作检讨——说他在“三大讲运动”中间的表现是一生中间最丧失党性原则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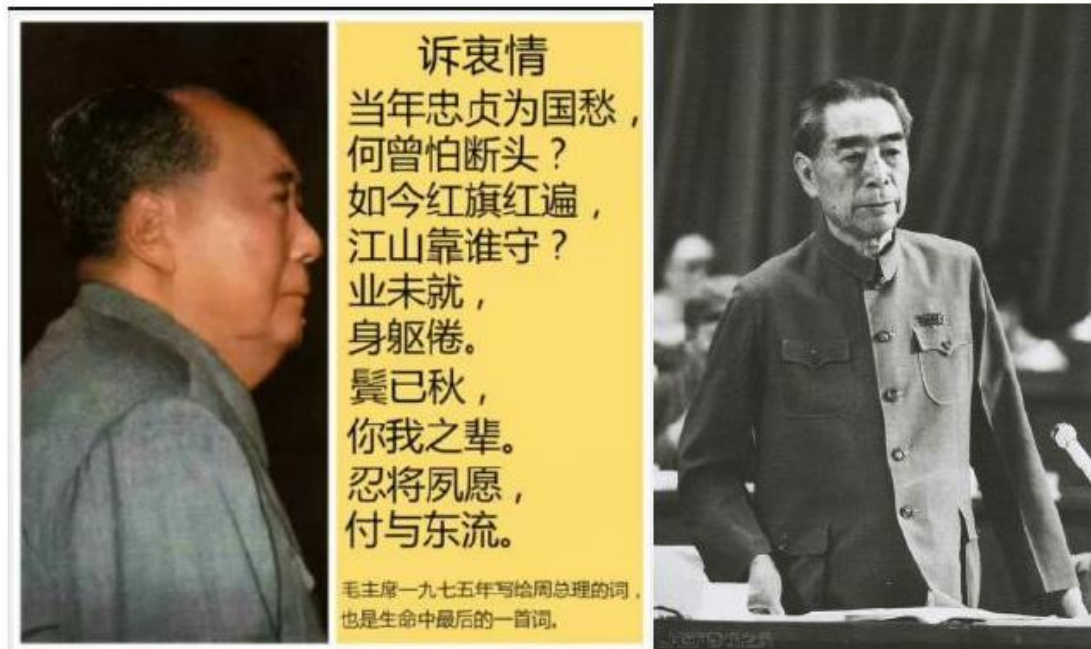
邓小平要求保护好党团员和劳模等人的积极性，给他们落实政策，对应文革“两清一批”冤假错案的事实，这是要求不再考虑造反派的平反诉求，而是要与此前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专案组成员)搞好关系，继续把镇压造反派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所谓“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

## **7、周恩来是如何累跨的**

正是因为遮蔽了官场多数对文革进程以及文革后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影响，未能恰当地揭示出文革期间相互博弈的政治力量及其所预示的后果，已有的文革史写作在事件叙述和人物评价方面，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如果不对文革造就的官场变化及其潜在的投机收益进行恰当

评估，就无法对某些基于政治需要而编撰的说法进行甄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周恩来。

有人考证毛泽东不是此词的原作者。暮年毛泽东给自己的老战友周恩来抄写了一首词，词意中寄托了自己的忧思：红色江山无人守，你我夙愿付东流。



在后文革时期，周恩来被认为在政治上有用性较高，官方文革史写作中间刻意把他从文革派中间“摘出来”，说他不过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办了一些违心的事，似乎周恩来原本是与毛泽东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政见且反对文革的，此种说法缺乏可靠的史实依据。在1966年文革早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面支持造反派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时期，周恩来接见并表态支持造反派的次数，远超任何一个文革小组成员。在1968年夏天之后，抑制造反派对于革委会权威的否定，周恩来出面做过很多思想工作，例如出面主持1968年国防冶金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是持续数月的马拉松式的会议）。1969年九大之后，周恩来还特意把湖北参加省市革委会结合的造反派头头接去北京，五次接见谈话并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停止反复旧，转过头来支持革委会的工作权威，有意见要在革委会内部表达。

1975年的8月，经过几次手术后，周总理对卫士抱怨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结合革委会成立之后的状况，主要是反文革派的当权派在镇压造反派方面不依不饶，使得协调工作总是做不完，周恩来



作为中央层次的具体负责人，不得不陷入此种没完没了的协调工作中间而难于摆脱。邓小平掌握权力之后，又以解决浙江“双突”问题为名，不仅逆转了周恩来对谭启龙的批评和谭启龙据此所做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还进一步加大了对造反派的镇压力度，这激起了更多的抗议和不稳定。

今天回顾，张春桥和江青预备当烈士的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似乎较为一致地在做向邓小平移交权力的工作，这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已经开始了，结束军队支左的同时就安排了邓小平出山，然后大批地解放文革前的党政干部，毛泽东为此还弹压批评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目的都是为邓小平掌握局面创造条件。不过，当权派的反攻倒算有点不择手段，导致毛泽东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示与其“划清界限”——1965年毛泽东就说过“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泽东把邓小平弄下去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特意安排没有军方背景与深厚资历的华国锋出来挂帅，假如华国锋在毛后时代肯定站不住（这是有可能预先知道的情况），据此解读的话，毛对身后事的安排就很有深意了，这似乎是在挖坑坑人，这种安排完全可以看做是预备某个人从后门重新爬上台。据后来所知，华国锋被人边缘化极其简单，在政治局内部开了九次生活会对其进行批评之后，华国锋就自己提出辞职了。

周恩来病重住院最后一次与身边工作人合影之后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这些实事都说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因为是在毛泽东一边，支持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批判活动，而且也一样受到当权派多数的憎恶和仇视的，他本人对于自己身后评价的看法也并不乐观，这个方面与张春桥和江青预备当烈士有着一致性。实际上，在1975年邓小平领着“四大金刚”翻案时期，张爱萍在国防科工委授意情报所刘毅民，组织多名翻译专门搜集海外攻击共产党领导人的材料，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周恩来的攻击文章。只是到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反对文革的高官们才发现周恩来在政治上原本可以派上大用场，这才开始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和文革切割开来，并给予其正面评价。

## **8、以巨大的镇压规模去确立新规则**

对造反派的眼里镇压过程及其巨大的镇压规模，不仅是对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进行再分配，还以追溯过去罪行为特点完成了规则重塑，现在，不仅批判当权派的错误是犯罪和不许可，而且在组织选拔措施和标准方面，也需要实施新的规则了。

经过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群众专政”阶段，至 1977 年年底由胡耀邦担任组长的“两案领导小组”成立，开始走出以群众专政方式镇压造反派的模式，建立公检法机构和党内的纪检机构接管镇压造反派的职能。

依据各地造反派做出的谨慎估计，全国接近 2000 万人被镇压，其中浙江约 400 万人，云南 150 万人，是全国受害人数最多的两个省份，云南层层揪四人帮，一直到农村的生产小队级别——在每一个生产小队里都要找出小四人帮来加以镇压。这一波空前规模的镇压，有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揭批查运动，第二阶段是公检法的审判，第三阶段是清查三种人，直到 1980 年代中后期才最后结束。

从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开始，最初阶段是保守派以“群众专政”方式展开“揭批查运动”（深揭狠批四人帮、查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造反派及其造反行动都被视为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武汉很多造反派头头都被百万雄师抓起来，除了捆绑游街之外，还长期关押审查。直到 1977 年年底，在中央级别成立胡耀邦担任组长的“两案领导小组”，此后开始驱使公检法这种正式的国家机器来接管镇压事务，到此时群众专政才结束，被保守派管制的造反派头头开始移交给公安局看守所关押。1981 年中央级别完成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之后，各地也随之在 1982-1983 年完成对造反派头头的审判。在走上审判庭之前，各地造反派头头早已经在监狱里面呆了六七年；而审判所依据的 1979 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当时政策和法律不认定为犯罪的行为不看做犯罪。就这样，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领导了一次世界性的读法审判，象胡耀邦和邓小平等人这样去应用法律，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的新情况。

此后，1983年开始的整党运动结合了所谓“清查三种人”运动，这一次是对那些够不上审判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进行党纪处分，手脚比较慢的机构直到1990年代才完成。多数造反派骨干在这一次党纪整肃过程中被认定“在文革期间犯有政治错误(或者严重政治错误)”目的是要把个人文革表现“写入档案、永不提拔和重用”。因为各地干部普遍抵制毛泽东提出的“建党五十字方针”，许多造反派作为青年工人和学生实际上未能入党，但在清查运动期间却被党委里新成立的纪律检查机构进行审查和处分。

作为1980年代“清查三种人”运动的一部分——对造反派尤其是大学生造反派——要对其文革表现记入档案，在政治上永远不提拔和重用。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老红卫兵的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对于保守派在

文革初期的超越政策要求的杀人伤人，乃至至于抢劫罪行都不予追究，却对依据中央号召和政策许可的范围起来批判当权派的造反派进行法外追究，还动用组织手段进行不公正压制，李锐等人的做法应该能够让当权派感到满意，却说服不了普通民众。李锐等人的这种做法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损害，是极为严重的，这相当于是为了满足权贵私人利益，而付出损害政权无形资产的代价。

在对造反派横加罪名并记录在案的同时，文革期间因各种劣迹或者罪行受到群众批判和组织审定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则洗清其一切不良记录，吉安(当时更名为井冈山专区)地委组织部于1979年写报告称：“我部根据省委赣发(1979)12号通知精神，抽调了四名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形成的干部档案材料，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这些材料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各单位和群众组织乱揪、乱斗、打击陷害干部并报地区文革领导小组呈批和存底的黑材料；二是‘三查’运动中地革委保卫部专案领导小组整理的材料，是于今年五月七日移交我部的；三是地委审干办公室移交干部档案中，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材料。这三批档案材料共计731人，档案750袋，三大捆，33卷，95份，有的同志其档案材料多达19袋，重达20斤。被诬陷的干部，既有地、市、县委领导同志，也有一般干部和职工群众，材料内容很多，有大字报底稿、揭发材料、反省材料、调查证明、调查报告、审查结论、综合处分，有被迫写的自我检查、交代、认罪等材料；还有运动期间抄家强行拿走的笔记本、书籍、生活照片。这些材料中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有‘走资派’、‘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老保’、‘坏头头’等等。”此种做法遍及全国，目的也是以此去确认群众监督的无效与非法，由此解除当权派通过文革确立的对群众监督的惕戒心理。

就这样，通过实施对文革派的过度打击，同时还对反文革派进行过度保护，共同的特点是把权力收回当权派的手上进行专断地行使，当权派行使权力时还可以任意摆脱事实、法律和道德的规约。这就是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确立的新的政治规矩，这样的开头极大地影响到了

后续的执政状况和权力运用规则，二十年后的中国官场中间，已经有高官相当公开地声称：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空前规模的镇压活动，不仅能够对过去的历史做出总结并预先消弭反对意见，还能够起到确立并推广新规矩的作用。按照奥尔森的经典分析，空前规模的镇压活动是把个人承担的监督成本或者行使批评权的成本显著提高，达到绝大多数人感到无法接受的那个高度上，然后，就能够鼓励更多的人选择“搭便车”而不是把监督付诸实施了。阿兰·巴迪欧提到忠诚和饱和两个概念去讨论人们的政治行为，其中忠诚概念可以看做是个人自愿承担的最高成本，在此成本线以下个人就采取行动而不是搭便车，而饱和则意味着确立人们对于过高成本的恐怖，不再为此愿意付出什么了。文革期间及其后，当权派对于造反派没完没了地进行追究和清算，近似于一种人为的饱和策略——这意味着在心理上完成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清算。一位武钢的造反派工人钟师傅说：我觉得政治太危险了，以后我再也不管他了，要专心学好技术把级别提上去。不几年，钟师傅就评上了八级以上钳工。不止一位造反派有着这样的痛切感受，不再关心政治，尤其是对干部的滥权闭上嘴巴，变成了新的“理性选择”。

看起来，空前规模的镇压活动，除了能够短期内贡献“五七一投机收益”底定领导权之外，还能够帮助确立贝特兰所称“工厂专制主义”改革的实施条件。而邓小平设计的“大政策”就是要把管理权集中于干部手里，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一把手负责制”此种大幅度集权的改革，如果没有被管理者的积极胁从或者消极认同，是很难完成和实施的。而空前规模的对造反派的镇压，近乎在每一个人身边都让你体验到“杀鸡吓猴”的效果——任何批评当权派的行为都会被追究、最终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镇压造反派为新的集权改革，预备了较为稳妥的国民心理基础。

# **附件 1：毛泽东教授的历史研究生戚本禹：**

## **怀念戚本禹同志**

我们见过太多有名无实的人和事了，今天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一个反面的特例：一个有实无名的毛教员学生和他的事情。老田打算以这篇文章，寄托自己对 4 月 20 日过世的戚本禹先生的哀思。

戚本禹同志追悼会侧记：（详见附件 2）

戚本禹 1950 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最初是为毛教员管理图书，他晚年撰文回顾自己的实现成长过程，自认为是毛教员的“私淑弟子”，得此近水楼台之便，他努力追随毛教员的读书过程，尤其是努力学习毛教员的思想和方法。

从戚老的一生看，他真正地做到了知行合一，切实践行了毛泽东的“五不怕精神”。在文革期间，戚老顶着官场的巨大压力，坚决地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各种倒行逆施，由此成了官场多数的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戚本禹于 1968 年年初进了秦城监狱，并在那里呆了 18 年。

对照有着相似地位的姚文元和张春桥的结局，戚老好像还沾了“便宜”，他 1968 年年初就进了秦城监狱，这对他来说也许不算是迫害，而真是一种切实的保护。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对于这些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人来说，砍头坐监牢是平常事，江青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仅有的区别是什么时候进牢房和坐多长时间。戚本禹于 1968 年进了监狱并于 1986 年出狱，张姚两人于 1976 年进去结果是终生都未能走出来。

### **一、好老师和好学生的几次良性互动**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用功极勤，那些靠历史混饭吃的专业教授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但毛泽东确实没有被任何一个机构评定教授职称，也不曾公开招收过研究生，戚老晚年回顾自己的学习过程只说自己相当于毛教员的“私淑弟子”。但是，戚老对历史的持久学习热情和毛教员在戚

老学习历史过程中间所产生的深刻引导作用，这种良性互动，是哪一对好导师和好学生都是比不上的。

1950年戚本禹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他学习历史的热情极为殷切，开始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得工作之便能够接触到毛泽东的读书选择和读后感，主席读什么书他就找什么书来读，主席在书中间有什么批示，自己买到书之后照样抄下来，就这样跟着主席读书和学习历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挑灯夜读，对于毛教员的历史感和政治感体会甚深。故此，1963年开始，戚本禹刚刚出道写历史论文，就得到毛教员的极口称赞。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戚本禹在读书过程中，深刻地把毛泽东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内化为自己看历史的方法，因此，戚本禹文章的观点和方法，都能够得到毛教员的高度认同，从他1963年批判《李秀成自述》的论文，到1965年评论翦伯赞历史主义的论文，毛教员都给予毫无保留的赞赏。就名义而言，毛教员从未正式招收戚本禹为研究生，但是，戚本禹对于历史的学习热情及其对毛教员历史感的拳拳服膺，使得任何一对教授和研究生都相形见绌。

2012年11月，老田曾经对戚本禹先生做过较为系统的访谈，他说到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是如何深刻地受到毛主席的影响的。初进中南海之时，他受命和田家英一起参与校订《毛泽东选集》，他和田两人对此兢兢业业，除了仔细审阅之外，还采取创新的方法：一个人读给另外一个人听，一篇文章往往要读和听十数遍，到了最后阶段，一个标点符号是否合适都有感觉。戚老说，这么读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的思想就都是毛主席的思想了，主席对工人农民怎么看，对知识分子怎么看，很自然地就成了自己的看法。戚老开玩笑说，当年文革小组成员支持造反派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为此遭到太子党群体的痛恨，一些人特意鄙薄他说“戚本禹只有行政十七级”，他后来实际担任过中办代主任、秘书局局长，虽然不止十七级，但也高的有限，真正让戚老感到自豪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他名列毛泽东选集编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自任主任，名单除了戚老之外，至少也是大区和大军区的高官，只有戚老不是因为级别高而入选的。

戚老特意提到一件事，来说明他为什么会如此拳拳服膺主席的思想。在校订毛选过程中，第一次读到毛主席在陕北的穷山沟里写的文章——《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这篇文章说，“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这篇文章中间提到一件事，恰好是戚老亲见亲闻的，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与主席有着天渊之别。

1947年5月4日戚老因事路过黄浦区警察局，亲眼目睹了由青帮组织小商贩围攻警局的事件，结果被殃及池鱼受了憋屈，当时的心情只是很气愤和愤懑，觉得国民党政权没有道理，这是纯粹从个人角度并就事论事地看问题的。同样一件事，毛主席却从中间看到了全天下的光明前景和蒋政权与民众的普遍对立，并就此做出结论——蒋政权在政治战线上的失败，还预言政治失败将会加速其军事失败。戚老说，这一次围攻警察局事件不是地下党组织的，而是青帮组织的，当时蒋政权为了打内战提高税收，小商小贩受不了了，青帮是收保护费过日子的，还履行责任组织小贩起来表达抗议，警察对抗议进行镇压这自然地发展到围攻警察局，综合后果是老百姓都觉得青帮比蒋政权更亲近一些。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心向背，能够领略到主席看问题的高度和战略眼光，群众为什么会有力量，还能够决定政权的兴废，戚老还评论说邓小平这些人老是不重视群众，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战线，动不动对群众镇压，这跟蒋介石一个路子，除了思想立场方面的原因之外，眼光过于低下和狭隘，所以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过这件事亲历的对比，戚老说自己只有局部眼光和一时一事的感触，不能不极度服膺于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天下胸怀，古人说不出门而知天下事，那是自我拔高和说说而已，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很少很少，



但也确实有，毛主席就是那样的人，真的能够见微知著，洞烛未来。后来知道，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处在陕北杨家沟，四个月前刚刚被胡宗南的军队从延安赶出来，国内整个的内战形势也是国民党军队处于全面攻势，毛主席就是能够超越自身的小环境和眼前的不利形势，放眼大的格局，从小事情中间看到问题的本质，并准确预言历史大势。

后来很长时间，戚老为主席管人民来信，一些来信反应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经过戚老综合上报之后，主席亲笔批示下来交办的很多，当时中办负责人之一彭达彰说过：戚本禹上送的文件主席批示的最多。戚老说，这个情况不是偶然的，因为思想和看问题的方式受到主席的影响，因此，很多问题的选择也往往契合主席的思路，得到主席的重视所以优先批办。

在一般的国家管理事务方面，戚本禹的眼光已经很接近毛主席的眼光了，所以，他上送的文件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在五六十年的国家政治事务中间，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盛行是一大顽症，最典型的就是1958年兴起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为了阻遏官场的机会主义风潮，戚本禹又一次和毛教员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1958年邓小平领着几个浮夸风风头最劲的省委书记，炮制了一个《十五年建设社会主义纲要四十条》，否定了毛泽东在1956年制订的《农业四十条纲要》提出的四五八(百斤/亩产)增产目标，提出要在十二年内把亩产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和八千斤，还说到了1967年要达到4亿吨钢产量。毛泽东强硬地搁置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纲要，提出反建议叫这些人去读书，首先是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果没有怎么奏效。为了阻遏官场的机会主义风潮，毛泽东两次把戚本禹派去基层，了解真实情况。1959年派去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亲自种试验田看一亩田看到底产量多少，最后数字是：按照各地官员在报章吹嘘的最科学的种田方法和最优的肥料投入，种试验田的产量是：小麦三百多斤，水稻七百多斤。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还曾经拿着这个数字(还包括戚老去劳模罗世发处了解的亩产量数字)，与邓小平欣赏的浮夸风省委书记李井泉辩论。

针对邓小平等人坐在城里头的办公室里靠“想当然”执政，1961年毛泽东再一次倡议官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此时，戚本禹受派去长辛店机车厂，他看到那些官老爷下来做调查研究都是些表面文章，因此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上送给主席，其中说到“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镀一层好看的金颜色，”毛泽东在批语中间首先夸奖“戚本禹是一个好同志”，然后强硬地批示说“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毛教员说“戚本禹是一个好同志”，这句话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给“贪污”了，坚决不给发出来，这个贪污可能是有道理的，如果是戚本禹成了好人，官场多数就不见得那么好了，事实中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二元对比”，足以揭示出普遍性的黑暗面，所以，聪明的编辑需要提高警惕抹杀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在邓小平时代，设立几个正部级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目的和任务就是为了重写党史，而在重写党史的同时要着力掩盖的就是官场阴暗面，对照毛泽东发动文革要群众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官场的阴暗面，这与邓小平设计的做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方法。

戚本禹几乎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站在官场阴暗面的对立面位置上，1963-1965年期间的学术批判时期也是这样。戚老在访谈时还指出：姚文元很多文章都是“尊上命”写作，是典型的“遵命文学”之作，后来要追究政治责任其实姚文元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他只是执行者；戚老说自己则恰好反过来，最初阶段的文章都是自己感到有话要说才写文章的，要有责任的话自己确实应该负责。

戚本禹跟着毛教员读了十多年书之后，1963年开始了独立思考和通过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过程，最初是对历史学界脱离史实和材料捏造结论的恶劣学风发出了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罗尔纲等人无视《李秀成自述》中间的史实，捏造所谓的“伪降说”据以不恰当地拔高其被俘后的表现。结果，这篇文章发出之后，中宣部的副部长周扬竟然组织大批权威们要对

戚本禹进行围攻，用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领域的恶劣学风进行保驾护航，由于毛教员的及时介入，这一次围攻最后无疾而终。毛教员后来得出结论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周扬的恶劣表现应该是做出判断的依据之一。

戚老在批判历史学界的学风恶劣之后，由于主席的介入，随后各路权威都拒绝在丧失绝对优势地位之后的平等讨论，所以，学风批评只得告一段落，无法进行下去了。他也在无意之间转移了战场，于1964-1965年开始对于历史学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持有强烈的不满意，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翦伯赞的批评上。戚老说起他为什么写批评翦伯赞的文章，他说自己在农村四清时期，当时支气管毛病严重咳血，就休息了一段时间。脱离了工作之后，有很充分的时间读书，按照自己的兴趣首先是读历史论文。戚老说，很长时间只是读历史理论书，不知道现时的历史研究状况，集中读到历史学界的论文时，戚老说他当时感到极度震惊，学界很多人士已经相当猖狂和露骨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公开地菲薄和以轻薄的口吻谈论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就这样，他拖着病体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写批评论文。因先前写批评罗尔纲的论文，受到周扬组织权威们的集体围攻（这次有组织的围攻因后来毛泽东亲自介入讨论而死于“未遂”状态），这一次就更加谨慎一些，后来毛主席评论说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点名，戚老说当时的情况是很难点名，那些人不仅有着权威身份还受到中宣部大人物的鼎力支持，谁批评他们就要遭到官场组织的围攻，所以只得尽可能谨慎行事，事先自行抹去文章的批判锋芒。

周扬组织权威们的围攻时，曾事先把请示报告送给总理审批过。戚老谈到，对于这一起未遂的围攻事件，对他自己的影响不大，围攻策划的初始阶段他本人完全不知道，知道不久毛教员就介入了，他反而成了有优势的一方，结果他的后续文章出来之后，罗尔纲等人就完全不理睬，戚老还感叹他是真的对历史问题有兴趣，试图通过辩论来澄清一些历史问题，但是那些权威们不一样，要么就是以绝对优势发言并打压你，只要是稍稍有了不利的态势他们就一句话也不说，让你想要辩论也找不到对手。戚老还说，他很钦佩总理的人格风范，周扬这些当事人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但总理却完全不一样，1966年4月下旬在上海锦江宾馆，总理特意为此事

承担责任，还当面向他道歉。许多年后，戚老还很动情地回忆当时的心情，总理那样的大人物几年之后还记着这么件小事，向一个年青人表示歉意；对比之下，官场很多大人物，他们干了很多的非法甚至是罪恶勾当，为了个人不承担责任，不仅搞上推下卸，为此还不惜系统地篡改党史，对照是多么的鲜明啊！

## **二、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支持青年人起来夺取意识形态**

### **领导权**

好老师对于学生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是人们通常易于承认和看到的。但是，好学生对于老师的反作用，同样强大，这是人们往往易于忽视的。在文革五十年后回顾，毛泽东为什么在文革第一阶段，反常地设计了一个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的“低成本革命方案”，过分看好“好学生”的表现并因此持有不合理的过高期待，恐怕占了相当大的分量。

今天文革过去了五十年，再回顾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承认，部分是出于自己学生的看重和期待，才拿出了他最初的文革设计。正是因为毛教员看到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所以，毛教员最初设计的文革，是支持青年人起来批判没有办法的老教授，试图借此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假如毛教员这个设计真的能够落实下去，显然文革会是一场极低成本革命——在不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就能够确保意识形态领域新的领导权形成。不过，这样的低成本革命模式，很少人感兴趣，官场尤其不感兴趣，学术权威们通常也选择拒绝平等参与的学术辩论，所以，这个设计首先是在学术权威面前就碰壁了。

从 1949 年之后，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争论不可谓不热闹，还产生过所谓的“五朵金花”——五个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样多的学术热闹，都被过滤掉了，毛泽东在这一次谈话中间，只是肯定了区区三个年青人和他们的批判文章。反复阅读这三篇文章（三文的主要内容见附录的摘录），同时对照文革的政治实践过程，可以看到，这三位年青人的批判文章，锋芒都直指无原则地过度肯定统治阶级及其对于社会矛盾的调处能力

和意愿，在其反面是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和政治主体性。孙达人批评的让步政策，戚本禹批评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姚文元抨击吴晗的戏说海瑞，都在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政治)主体性问题上，走到了一起。破除当权派对于权力的垄断，确立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特别是组织权和批评权，是文革政治实践的关节点问题。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就这样具体地扭结到了一起。

1965年“12月21日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毛泽东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年谱》第五卷）据戚老说，关锋曾经把主席的谈话转达给他，他当时感到难以置信，主席就算是夸奖和鼓励年青人来说话，也不至于要说一篇文章读三遍吧。

上述这个摘录来自官方文献，所以很不全面，省略了很多关键内容，读者无法从中把握一个看法是如何依据材料而产生的。据文革时期披露的文献，这一次谈话还有着其他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大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第246-248页）毛

泽东的这一段中间，有些内容与人们的常识相反，老教授在学术和政治进步方面都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只能够寄希望于年青人，这一反常识的说法，需要展开来仔细剖析。

就作为读者的一般人而言，多愿意相信权威教授及其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对于名气小的年青学者较少注意。几乎每一个走上大学课堂的学生，都会被教导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要更多地注意专业领域的顶尖权威，要写出一篇好的论文，最初的扎实工作就是要把握相关领域的最顶级权威的研究及其结论，然后才能够添加自己发现的新经验事实，再据以对权威们的说法提出修正意见。这其实就是学术圈内最为流行的“学术增量说”——任何一个学者的研究，有且只有在充分考虑了“既有的学术存量”的基础上，根据新事实再做出修正和推进以生产出“新的增量”，能够在圈内得到承认和引用。一般而言，中国学术界所谓的“学术存量”多是指来自西方学界的理论和学术积累，这一学术增量研究方式，就目前的实施情况看，是要求把中国的学术研究链接在西方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很接近于“东方主义”所揭示的各种情况，是一种思想研究领域的殖民化取向。

毛教员的想法，与人们的常识和规则有着根本性不同，他要处理的问题当然也很不一样。普通人关注历史和学习，是要学习历史知识生产领域的学术存量，即便是从事专业研究也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追寻前进的空间。而毛教员的目标是通过历史学术的辩论过程，生成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这一“除旧布新”的目标之下，毛教员发现的重要情况有二：一是有着权威地位的老教授基本上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二是只能够寄希望与年青人。

我们来具体地看看毛教员怎样批评老教授和奖挹年青人的（毛教员的相关思想在官方文献中间被删削得过于厉害，以至于无法得窥全貌，下述文字均引自1968年武汉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段落末尾的阿拉伯数字是书中的页码。）：

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

“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246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

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要象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正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毛泽东：五一六通知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应该说，是戚本禹和姚文元等人的历史学术批判文章，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信心，相信可以借此确立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历史研究的进步促进所需的政治认识的提升，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改良。

### **三、对照文革后的史学研究领域的变化来看待“作为政治研究方法的历史”**

在1949年之后，曾经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现在已经进入殿堂并成为笼罩性的解释框架。为这一解释框架形成，做出过贡献的人士现在成了绝对权威，难于挑战。按照人们的看法，这些最顶尖的权威合称“马列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这样一来，毛时代的史学研究就呈现两种凑合在一起的对照现象：资料搜集和研究方法上的帝王将相史，和解释方法上的“五阶段论历史观”，借用下面布罗代尔的看法，前者是短时段的事件史研究，后者是把长时段伪装成超长时段的结构史，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把事件史无节制地膨胀用以吞噬长时段。以短时段吞噬长时段，在翦伯赞和吴晗那里就具体地表现为要在统治阶级具体的成员身上寻找出“阶级斗争的正面成果”，为此吴晗把清官说成是决定一切的主体，翦伯赞更为普遍化地提出“让步政策”。

绝顶权威的形成及其在学术场域的霸主地位，即便是从纯学术出发，也有着很大的消极作用。法国学者布迪厄把学术场看作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场域，每个人的入场及其采取的竞争策略，端视其自身的资本存量，一般

而言，通常是大资本具有垄断地位并往往破坏规则和惯例，在学术上就表现出轻率和随意地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不遵守逻辑推理的规则。小资本入场之后，不得不依靠提升自己产品的品质，去和大资本竞争稀缺的话语权。吴晗任意地拔高海瑞，翦伯赞随心所欲地臧否农民战争，都是与大资本和垄断地位有着内在因果关系的表现。在毛时代的中国，这种大资本的垄断地位，部分来自于自身的努力成果——过去确立的学术地位，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权势人物的无原则扶持，毛教员后来响亮地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就是指大资本背后的权力及其对学术垄断地位的无原则扶持。戚本禹批评罗尔纲漠视事实，毫无根据地坚持李秀成“伪降说”，罗尔纲这种治史方式，体现了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无视关键史料的随意性，这个批评证据确凿，但是，却遭到中宣部组织权威们群起围攻，这非常具体地揭示了大资本垄断地位背后的权力因素。戚老说，周扬组织大批人要围攻我，我起先都不知道，所以一点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结果主席知道之后，特意调阅了海外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最后写了十六个字的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这些人看到批语之后，还对我封锁，我一直没有看到过主席批语原件，后来是同在《红旗》杂志工作的邓力群告诉我，说忠王不终是善始善终那个终，不是忠诚的忠，我这才准确地知道到底是哪十六个字的批语。

借用布迪厄的术语，毛教员显然认定：学术进步的实现是要通过一次又一次小资本对大资本挑战和颠覆来实现的，这个结论看起来很接近美国科学史教授库恩的“范式革命论”。准此，从学术进步而言，支持小资本的成长，就比维护大资本的垄断更为有效，我们来看看毛教员就此说了些什么。1965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中间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毛泽东传》P1405）1966年4月16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P1407）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把大区负责人找去杭州打招呼，说：“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

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王任重日记，1966年6月11日）【《毛泽东传》P1417】毛教员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扶持年青人，让这些人完成“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亲自设计了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的文化大革命方法，为此，还反复给各级各地的当权派打招呼。

邓小平似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小资本对于大资本存在着过度威胁，依据邓的意见，布迪厄对学术场的竞争策略总结也是彻底错误的，按照邓的说法，毛时代的中国简直是小资本或者年青人的天堂，话语权分配不是有利于大资本而是有利于小资本，那个时候小资本可以任意地欺凌大资本，结果导致大资本无所措手足。据亲历者回忆，邓小平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百年潮》1998年第4期】不管邓小平说的有没有根据，反正今天的党史国史，就是按照这个口径来编织材料和结论的。如果邓小平这个说法靠得住的话，显然，必不可少的凭借是中宣部等只支持小资本，而不是支持大资本的垄断地位，这个方面目前还缺乏最起码的证据。

文革前夕史学界的争论及其涉及到的问题，不只是中国学术界才有的问题，西方同样存在。在1958年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正式提出了长时段概念，对于传统的短时段和事件史方法给予无以复加的低估：“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许多连带意义，它有时会为一些深刻的运动充当见证，并且通过种种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以往的历史学家乐此不疲——吞并自身以外

的长段时间。它可以被无限延长，自由地或勉强地与一系列其他事件或隐蔽现实相联系，从此再也不可分开。……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所付的赎金。”【(法)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51-52 页】布罗代尔说的很含蓄，他没有直白地说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研究统统都是废话，而是说废话还有些作用，相当于“赎金”或者说“学费”。

毛时代的中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条件有限，未能及时了解到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崛起，及其对“事件史”和“政治史”的批评和贬低。结合文革前夕史学界的争论看，很明显，毛教员表扬的三个年青人，在治史方面是眼光向下的，注重底层民众的主体性，反对过分突出帝王将相和统治阶级，反对由事件史和政治史方法对结构做出轻薄和任意的解释，这恰好是一些老教授们乐于坚持的方法和努力方向。在事件史和政治史中间，由于框架和材料之间的疏远关系，缺乏对于深层社会结构的揭示，历史学在做出解释时，往往渗透了学者个人的主观偏好，因此充满了任意性。翦伯赞对农民战争后果的任意解释，吴晗脱离材料和历史实际任意拔高海瑞，除了个人的主观原因之外，还客观上存在着方法论方面的严重缺陷。毛泽东批评翦伯赞和吴晗只搞帝王将相，这是指材料关切而言的，但这些人却把帝王将相的材料“粗暴”地链接到“五阶段论历史观”解释框架上，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的思想，这两个人在史学方法方面的问题在于：用短时段的事件史材料，强行与五阶段论的结构性框架进行比附和解释，这是典型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除了学术上的霸主地位及其腐朽的垄断特性之外，官方对于权威们的无原则支持，恶化了坏的学风，这种用短时段事件去吞噬长时段结构，往往容易出现解释上的随意性，正是因为治学方法方面的缺陷，这些被批评者往往难于完成有说服力的自我辩护，结果，助长了一种机会主义选择：学术权威们在丧失绝对优势地位之后就拒绝发言，结果，这就被解释为一种拒绝听取批评意见的顽固政治立场。

在鄙视了短时段和事件史之后，布罗代尔自己推荐解释深层结构力量的长时段研究方法，“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75)”为此，需要揭示社会的深层结构，“‘结构’……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构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把长时段接纳到史学研究中来不是件好玩的事。这不是简单地扩大研究和兴趣的范围，也不是仅仅对史学研究有利的一种选择。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上——不是别的层次——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法)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57页】

要揭示历史深层的结构，就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问题，呈现这样一种历史有很大难度，布罗代尔说：“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群众的历史，并且容易承认群众对历史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不容易看到这股力量的方向或规律。”(同上书，63)

毛时代的历史学界中间，事件史和政治史的主导地位，及其对于结构揭示的简单淹没，确实是一大缺陷。同时，在一个学术场域中间，大资本的垄断地位过强，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学风，一些拥有超额话语权的大家，往往随心所欲地挣脱“要由材料说明结论”的规则，任意地解释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到了“游戏着历史学”的程度，在这个方面，一些权威人士的表现就跟今天的娱乐片导演差不了多少，为了吸引观众必定要在影片中间加上美女因素，翦伯赞脱离历史实际无节制地吹捧王昭君，

郭沫若也力推蔡文姬。这种极端不严谨的治学态度，能够堂而皇之地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与大资本拥有“人莫予毒”的垄断地位是分不开的。【翦伯赞《题昭君墓》诗云：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风烟。如何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老田按，呼韩邪单于南下附汉，是因为匈奴内乱，为此亟需结好汉朝，并非因为和亲政策很成功，这首诗所宣传的历史认识，确实已经到了“轻薄为文”的地步了。】

如何看待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紧密相关的政治主体性，是一个贯穿文革十年的主题。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及其追随者以“毛泽东的天才”作为证据来否定之，毛泽东在反驳这一妄说时，鲜明地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对比。等到邓小平掌握实权之后，1979年就开始有历史学界的官员明确出来为林彪集团“站台子”，著名的黎澍先生就数次撰文“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同主题论文黎澍的自选集就收了四篇），否定毛泽东的看法，部分地恢复林彪集团的看法。根据王若水的看法，黎澍文章的效果好得不得了，“在黎澍的这几篇论文之后，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那个老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命题，不可能再有市场了。这是黎澍的功绩。”【王若水：唯物史观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载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在法国，长时段概念及其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结合的思想，在布罗代尔等人的提倡之下，到1970年代末期逐步成了主流。【“这一概念（指长时段）在50年代还只是一种预测性的提法，而今天（1978年）已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同时又变得平凡化，并常遭人反对。”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上书第132页】在中国则恰好相反，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黎澍等人在权力支持之下，否定史学的结构性倾向却占据主流，中国的史学研究逆历史潮流而动，向着事件史和政治史倒退，附带地，连文革前那相对空洞的结构史学框架，也逐步地瓦解了，史学研究走向彻底的碎片化。

因为要否定人民创造历史，在其反面就需要确立英雄或者精英创造历史的叙事，相当一段时间内，历史学界很多人把“市民社会”研究作为重点，相当于是确立“资本家创造历史”的结论。对照中国近代史的实际，

这个学术上的努力遭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从 19 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开始，资本在中国的活动成果极其有限，到 1949 年全部工业资本积累不过 120 亿元，而在共产党否定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之后，仅仅一五计划期间新形成的固定资产就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

由此，为确立资本家创造历史的主题思想，就必须彻底地“黑共”，就算是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资本积累数字很大，也肯定会付出过高的道义代价——例如说共产党剥夺农民搞剪刀差政策、共产党搞公社化是法西斯等等。总之，如果不把黑共进行到底，精英创造历史的主题就很难确立起来。虽然这一努力在学术上遭遇到重大困境，但是在政治宣传上的成绩却不小，共产党中宣部主管的高大上媒体央视就力挺过《走向共和》，否定一切革命包括共产党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历史研究领域的争论过程中，还要一个未曾挑明的方法论问题：作为政治的历史学和作为历史的政治学。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崇尚所谓的“顶层设计”和“治理机制”研究，这些方法论在毛时代是没有地位的，这倒不是因为毛时代坚持群众路线的缘故，而是在方法论上否定“脱离过程的规范”（曼海姆语）的任何可能性，不承认一切凭空设计的制度。研究历史，首先是要观察一个社会中间相互作用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方式，寻找各个群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表达和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方法的历史，其对于政治改进的指导性作用空前上升。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只承认一门唯一的社会科学——历史社会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讲到过历史科学的唯一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视野：必须从社会和历史过程的经验基础上来讨论政治，借用布罗代尔的术语，社会演变过程中各种结构性要素的作用及其相关性需要如实地得到呈现，今天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间，试图以“黑共”为代价确立资本家创造历史的主题思想，恰好是省略了历史演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结构要素去进行事件史研究，目的却是试图得出“中时段”——新社会阶层出现的历史和政治正当性——甚至是长时段的结论。

文革肇源于历史领域的批判，不是偶然的，那是一种方法论的重申。正是在这个批判审视的场域里，旧有的权威及其短处和局限特别严重，跟

随共产党执政地位而加固的学术权威地位，更恶化了历史研究的政治感和方向性。彭真为了庇护吴晗，竟然拉着中宣部单独为此出台政策，这就超越了政权合法性强化学术权威地位那样一种公权力误差，而是典型地体现了“公权力为私人需要立法”了，彭真为了“死保吴晗”（毛泽东语）甚至还因此设计出“混战一场”和要对“左派整风”的《二月提纲》，恰好佐证了学术蜕化与政治蜕化互为表里，而且是一种最为恶劣的表现。

彭真本人及其恶劣表现都不是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问题在于彭真的表现代表的是一种权力结合学术、学术服务于权力需要的恒常取向，依据历史研究领域的表现——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主要趋势都是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和政治主体性，脱离史料无原则地抬高统治阶级的历史主体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P259）这就需要认真加以对待了。

#### **四、为什么革命和历史都是永恒的**

社会的真实演变过程构成真正的历史，把这些演变记录下来并加以解释就成了历史学，历史学除了面向过去之外，还需要对未来有所担当，人们需要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理论认识，据以指导对未来演变的干预。

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学术引进中国之后，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大部分纳入依据西方历史材料形成的学术框架进行解读，这个局限或者大趋势至今未变，后来转向市民社会研究的章开沅教授，称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认识分歧和争论不过是“西人与西人战”。布罗代尔把兰克以降的事件史研究，看作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所付的赎金”，而对于中国的史学领域而言，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迫切需要一份走出东方主义的理论自觉。

在对历史材料的把握方面，毛教员的勤奋程度远超绝大多数历史系教授，据为毛教员管理图书的逢先知回忆，两种主要的官方史料《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毛教员读过十七遍，《二十四史》通读过不止一遍，迄今为止，尚未听说有哪一位大学历史教授读史料书比毛教员更勤



奋的。而且，由于毛时代史学研究主流是一种结构史伪装下的事件史，在历史短时段中间军事和政治的分量特别重，绝大多数历史教授实质上不太懂政治和军事，这恰好也是毛教员的专长领域。正是因为对于史料的熟悉，以及对错误解读史料的洞见，毛泽东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吴晗本人没有读过《明史》，他的某位学生倒是读过。从材料把握和军事政治知识掌握看，毛时代的历史研究特别不能够让毛教员本人满意，他本人长期关注所谓的史学革命，说穿了，是因为现实情况让人感到绝望。毛教员对一些老教授的评价，准确地说，不是失望，而是绝望。正是因为对于史学领域权威教授们的绝望，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教员那样高看年青人表现的进步，并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他对戚本禹的夸奖到了戚本禹自己也觉得难于理解的高度。

历史和进步和政治的真正改良，是需要克服现存社会结构中间的阻力，才能够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认识过程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革命家的看法，也是所谓的革命路线的应有之义。而把学术进步看做是存量的逐步增加，则是庸人的看法。1979年之后的历史研究领域，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历史进步看作是大人物及其行为推动历史进步的论证方法，在近代史研究中间突出资本和资本积累推动历史进步的历史重写过程，结果怎么样呢？

告别革命口号的提出，是一场真正的思想方法的革命，这意味着历史不需要排除结构性的阻力就能够前进，研究历史不再需要呈现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过程，这样一来，所谓的历史进步或者退步，都将肇源于人心，尤其是大人物的偏好和需要。这样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将是极其“自由”的——历史研究集中于大人物及其心理活动，由此去解释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而历史学家们获得一种巨大的纸上权力——可以对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自由地界定和评价，并相当自由地与历史进程进行因果链接得出各种自己喜欢的解释。

在另外一个方面，任何企图要进行低成本革命的设想，都不会成功，这一点恰好是绝对真实的。在文革开始之前，毛教员设计了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的文化革命，结果毫无效果。他支持了戚本禹，瓦解了中宣部组

织权威们的围攻，帮助戚本禹获得了与老教授平等对话的机会，他不忘记告诫戚本禹要注意以理服人——不要期待一下子改变别人一辈子的观点，结果是什么？老教授们在丧失了优势地位之后拒绝平等对话，坚决不发言，罗尔纲和翦伯赞都是如此，吴晗也不例外。毛泽东期待的青年人与老权威的平等对话，通过学术争论来推进认识进步，结果争论还没有展开就已经收尾了。戚老说他当时很幼稚，认真搜罗史料预备与罗尔纲等人好好辩论辩论，结果罗尔纲等人要么拒绝辩论，要么装一个低姿态承认错误然后就懒得发言，戚老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荷戟独彷徨”。（鲁迅诗句）看起来，学术场域中间的竞争，与市场经济中间的竞争有着很强的相似性，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最关心的只是自身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对于技术进步没有多少兴趣。在学术场域中间的竞争也是如此，相比较大资本而言，小资本的学术在说理上更为规范，戚本禹当年就有发现，据学部历史所研究生孟祥才回忆，同样是主张历史主义，缺乏大资本地位的宁可（北师大历史系教师）就与翦伯赞很不一样，“宁可的观点也不是全错，不过他将历史主义强调过头了。翦伯赞讲历史主义，理论上的论证不够，宁可对历史主义的论证就深入多了。”（孟祥才：我所知道的戚本禹，载《历史学家插座》第十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后来，毛教员亲自领导起草了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撤消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各个地方的省市委书记成为这一政策执行人。执行的结果是：王光美创造的“搬石头”和刘少奇欣赏的“反右派”经验成为主流：各种上级讨厌的下级官员被选为“搬石头”的打击对象，或者从事实出发批判工作组的学生被打成右派，这两种模式成了运动的主流。而在中央层面，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李雪峰等高官，都一窝蜂地积极地拥护这两种体现严重政治异化的运动模式。结果，文革不得不进行第二次转型，毛教员和周总理支持文革小组出面支持群众，让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官场坏干部和民间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共同造就的政治异化现象。至此为止，每一个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群体，都拥有自己的小算盘，共同点是“革命潜能为零”，都证明自身和他们选择的依靠力量，不可能为真正的政治改良做出任何正面的贡献，准此，寻找

民间的批判性力量并扶持其壮大起来，就成为绝对必须的事务。为此，重新起草了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文革小组成员成为监督落实政策的积极执行人角色——一路支持造反派这样一种起于民间的批判性力量的成长。

文革被迫转型，意味着毛泽东低成本革命的设计，在现实中间遭遇到的第一波挫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理论的成熟，远远落后于经验的积累过程，这是一般性的认识规则，黑格尔名言常常为人们引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毛教员设计的低成本革命，并试图以此促进认识进步和新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这实际上是要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清晨就起飞，实际上难于实现。而且，就文革政治博弈进程而言，认识对于现象的剖析，还需要符合现实政治博弈的限制和需要，无法就认识所达到的深度进行总结和表达。

文革小组全力支持造反派的崛起，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着内在勾联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群体，则反过来强烈反对造反派和文革小组。就这样，执行资反路线的两个人格化群体，现在变成铁杆反文革力量，他们对于造反派的抵制和联手镇压，很大程度上刻画了文革的基本面貌。文革到了1967年夏天，国内各个阶层和群体，都已经参与了“这一场认真的演习”中间来，并按照其本能的需要和利益诉求选择了站队和表演。文革在强大反对派的作用下，陷入僵局，而且不存在“向左破局”的机会，或者说，强硬地选择向左破局的话，社会成本过高难于承担。由此，向右破局的选项，在反文革派的强大力量主导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毛教员和周总理，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有明确的认识，并且较为自觉地否定了向左破局选项，1967年9月底毛教员回到北京之后，有人当面询问为什么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毛教员回答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后续的文革进程中间，各地造反派受到严酷而长期的镇压，这是当权派联手保守派获得向右破局机会后的自我确证。

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支持造反派的成长和壮大，不仅没有错误，还符合文革转型以来文革小组的基本职责。问题在于政治方面，各个阶层和群体都参与到文革演习中来之后，反文革派的力量过于庞大，同时文革派

内部的整合极为不充分，这两者决定了向左破局的可能性极小同时向左破局成本过高。“揪军内一小撮”本身不存在任何错误，就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而言，但是，这个选项却不具备相应的实施条件——在没有其他的有组织力量足以维护最低限度秩序的情况下，军队作为维护秩序的核心地位就无法动摇。把“揪军内一小撮”进行到底，实际上就是要整合极为不充分的造反派为核心，瓦解甚至镇压当权派多数和保守派多数来实现秩序，这个选项的道义代价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上海显得很例外，王洪文领着工总司，先是顺利地吸纳了民间的保守派多数，接着又快速实现了工总司内部的整合，还用强硬手段瓦解了外部的反对派——上柴联司和支联站，造成了群众力量的相对统一局面；在难于组织保守派对抗造反派的政治局势下，多数干部只能是理性选择“检讨、亮相和结合”的三步走政策通道，选择与造反派合作，最终具备了向左破局的先决条件——无需镇压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情况下就能够恢复秩序，上海在文革十年期间造就了“造反派掌权”的例外局面。

文革小组诸成员，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陷入就事论事的局部眼光，看不到全局的结构性对比关系，因此，所作出的选择就存在着巨大的盲目性。在行政眼光里，文革小组继续支持造反派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但是在政治眼光里，文革小组成员的错误就很明显了——不了解文革陷入僵局之后，向左和向右破局的各种后续影响和含义，尤其是不了解向左破局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

反过来，文革小组成员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群体，受到的长期和严酷的镇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反证：低成本革命不成立，公有制社会里一样存在着维护既得利益和权势的准阶级存在，任何质疑他们优势地位的人或者群体，都会受到他们毫不留情的镇压。就这样，文革就像是一个自我确证的预言那样：通过一场演习、特别是反文革派的表演，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真正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治改良，也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去克服来自特权阶级的阻力，而且，文革还让人们看到这个阻力多么巨大。由于进步所需要克服的阻力过于巨大，就像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那样，在革命遭遇到挫折之后，很多先烈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戚老的十八年冤狱，张春桥和姚文元终生未能获得自由，都是这一场未遂革命的巨大代价的一部分。

今日人生成功标准是要升官发财，以此而论，戚本禹先生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更准确地说，戚本禹先生是一个历史受难者，应该补充的是，戚本禹先生主要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原因而受难的，他是为人民的权力——首先是人民对于当权派的批评权——而受难的牺牲者。作为一个牺牲者，他先是蹲了十八年的大牢，走出监狱之后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依然牢记毛教员的教诲——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评价历史人物，退休后领的是上海市最低退休工资(官方核定他是只有一年多工龄的退休人员)，而且，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受到官学两界的长期封杀：他走出监狱之后三十多年，大陆正式媒体没有发表过戚本禹署名的只言片字。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间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戚老显然就是官方正史的无穷诽谤也无法掩盖其光耀的那种人，也是毛教员所说的那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

文革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到底收获了多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常常在左翼圈内激起激烈争论甚至是情感对立。

我们来看看毛教员自己是怎么说的，1962年9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上讲话时说“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有几次复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51页】按照毛教员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很难一次成功，关键在于人们的认识进步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够得出稳定的共识。所以，争论文革一时一地的成败，在曲折前进的历史趋势面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速胜论”思想作怪的结果。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复辟过程，是与人们思想进步的难度成正比。所以，正确的态度是：不让前人的牺牲被白白浪费，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让我们的同志和他们付出的代价，尽可能地有益于人们认识的提高，由此，更快地结束前文明时代走向真正的人类文明。从认识成长的意义上看，文革作为一场检阅战斗力和参与战斗各方优缺点的演习，对推进认识进步的潜力极大，我们今天需要继承前辈的遗志，把这一点发扬光大。

在认识进步的曲折道路上，无论多么大的失败，只要是有助于提高人们认识、帮助更快地形成人类文明追求的努力，都是历史性的成功，在这一点，戚老和他的战友们，确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到了社会主义真正胜利的那一天，也许人们会效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们那样建立一个“先贤祠”，记录为人类走出野蛮做出独特贡献的先辈，毛教员和他的研究生戚本禹，都应该有资格入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就像是物理学中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相互作用一样，毛教员说：“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

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一九三五年毛教员就批评过一种思想方法：“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文革时期“唯我独左”就是妨碍造反派完成政治整合的第一号障碍，今天的左翼圈内，有不少网友确有这种关

门主义风范或者说政治洁癖。在文革期间，经过毛教员的批评之后，文革小组成员的改变也是明显的。

毛教员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反对把文革的批评锋芒指向当权派和保守派多数，不是因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是单纯的策略，而是因为：这些政治异化现象及其人格化承担者，其表现都内在地符合社会分化的规律，要解决社会分化规律造成的问题，必须真正地做到借助人们认识提高来实现，团结干部和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绝对必需的要求，没有多数人认识的提高和共识的形成，团结目标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缺乏共识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革政治博弈和运动的走向，同时也决定了问题不可能在多数人没有觉悟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为此，不仅文革需要转向或者强行结束，而且，基于事实和法律而形成的判断，还不合适公开地进行宣传。老田反复阅读 1967 年 11 月 6 日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时，曾经非常疑惑，为什么文章不引用中国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情况来展开论证，而是大量讲述苏联如何变修，要知道老军头镇压群众、当权派操纵保守派歪曲运动大方向是论证社会结构阻力更为有力的证据。很久以后才明白，文章虽然是为了总结文革的实践经验并且进行初步的理论提炼，但是，对于大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虽然他们是反对文革的，但也不能够站到对立面去指责。不过，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曲笔，今天不再需要的，我们有条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认识大大地推进一步。

文革和文革后的事实，都在验证毛教员事先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 卷】

孔夫子都承认“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让老百姓没有出路的统治阶级肯定是要完蛋的，因此，革命的潜能始终是由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利益兼容性来决定的。毛教员相信革命，正如他相信复辟不可避免一样，复辟的统治阶级以垄断政治权力和阶级利益为主要特征，排斥多数人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高要求，这就必然地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这就为自己造就了对立面——革命者，孙子起来暴动并推翻老子就有其历史必然性。正是历史完成了这样的循环，所以，文革是不朽的，文革的那些牺牲者也是不朽的，这将会为一切后来者照亮前进的道路。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 **五、附录：姚文元、戚本禹和孙达人文章的论点摘录**

###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贫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儨”，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



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

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⑨。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

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

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 **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翦伯赞在 1951 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1961 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

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

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载 1965 年 12 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

## **附件 2：戚本禹同志追悼会侧记：风雨激荡五十年 生死英雄戚本禹**

摘要： 2016 年 4 月 24 日(周日)上午 9:30，戚本禹同志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二层银河厅举行，戚本禹同志家属、亲友及各地左派代表与群众共四百人左右参加追悼会，向戚本禹同志表示哀思。4 月 20 日清晨，在听到上下两卷、六十余万字的《戚本禹回忆录》付印的消息后一个多小时，7 点 58 分，戚本禹同志安然离世，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无可替代的精神遗产……



### **革命前辈戚本禹同志追悼会侧记**

#### **——风雨激荡五十年 生死英雄戚本禹**

2016 年 4 月 24 日(周日)上午 9:30，戚本禹同志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二层银河厅召开。



**(戚本禹同志 2016 年 2 月 24 日在深圳港大医院静观癌症诊断书)**

虽然有关部门曾事先发布通知禁止除亲友以外其他人参加戚本禹同志的追悼会，并对某些试图参加追悼会的同志进行“重点关照”，但除了戚本禹同志的亲友外，仍然有全国各地的左翼同志代表与慕名而来的群众约三百人参与了追悼会，并有不少未曾到场的知名左派学者赠送了花圈。

整个活动形式庄重肃穆，先由戚本禹同志女儿朗读悼词与介绍戚本禹同志的前半生生平，之后集体向戚本禹同志三鞠躬并瞻仰遗体告别，向家属表示慰问。

《红色参考》杂志编辑部与红色中国网友也派同志专程前往追悼会与敬献花圈，向戚本禹同志表示哀思也向家属致以慰问。

随附《红色参考》微信号所发布有《红色参考》杂志社执行主编陈洪涛同志所写的悼念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风雨激荡五十年 生死英雄戚本禹”。



2016年4月20日上午,《红色参考》从不同渠道得知文革老人戚本禹同志于当日清晨7时58分因病在上海逝世,即与戚老家人取得联系,向这位革命前辈、前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成员致以敬意,表达哀思,并对戚老家人表示慰问。

戚本禹同志,山东威海人,1931年生于上海,早在1947年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时期就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前往北京的劳动大学(中央团校前身)进修,由于表现优异,1950年19岁时即被选入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的编校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曾担任过毛主席与江青同志的政治秘书。

1958年整风期间,戚本禹同志与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其他七位青年同志因向组织反应问题,遭到时任中办领导杨尚昆等人欲借反右之机打击报复,后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得以平反。被毛主席称之为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文革前,戚本禹同志即积极参与理论斗争工作,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评李秀成自述》,震动史学界,毛主席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1965年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评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因为无形中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南北呼应,从而被毛主席称为“南姚北戚”。“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6年在毛主席主持下,戚本禹同志参与起草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1966年在《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967年在《红旗》杂志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曾得到毛主席亲自修改、周总理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1967年“七二零”事件后，由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受王力、关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左倾事件的影响，在王、关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五个月后，1968年1月14日亦被隔离审查，这就是文革初期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王、关、戚事件”。文革结束后，于1980年7月14日被作为江青等文革派的骨干和追随者而遭到逮捕；1983年11月2日被邓小平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成为“王、关、戚”中唯一受到刑事处罚的人（王力因投靠邓小平、关锋因在狱中精神失常而免于起诉）。自1968年被隔离之日算起，“没有少坐一天牢”（戚本禹自言），于1986年刑满出狱，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任图书管理员。

戚本禹同志在出狱后的三十年来，作为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基本权利一直受到非正常限制，不能使用本人真名对外联系和发表作品，就连身份证上也只能使用化名“戚文”，但他仍然积极关注国内外社会局势，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与妖魔化中国革命史的言行，对共产主义前途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充满信心。

他始终坚持文革立场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思想，坚信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对追随毛主席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信仰至死无悔。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际，曾发表《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的回忆文章（《红色参考》2013年第12期刊发），公开表达了只有毛主席才是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深邃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最近几十年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主席确实是高瞻远瞩”的观点。

戚本禹同志也是《红色参考》的读者，从《红色参考》创刊以来一直关心我们的发展和青年红色网友的成长，既积极鼓励、献计献策又坦诚地提出批评意见，使我们受益匪浅。尤其是在2014年5月19日和2015年数次与《红色参考》工作人员的长谈中，对未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正在成熟起来的中青年左翼一代寄予了厚望。

戚本禹同志从2011年以来在友人支持帮助下一直抓紧写作回忆录，力图从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角度还原真相，给后人以交待。去年7月，书稿中有关江青同志的部分内容传至左翼内部，多家左翼媒体以《回忆江青同志》

为题转载，其中大量珍贵史料均系首次披露，澄清了一直以来某些人对江青同志别有用心的污蔑中伤及诸多误传，以翔实的证据使我们知道了江青对周总理的尊重和周总理对江青的爱护、“两人亲如兄妹”等等客观事实，尤其是对我们了解文革高层政治活动和掺杂其中的微妙的人事纷争，研究文革派与走资派的复杂斗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戚老著史认真负责，在《红色参考》因转载此文而向他征询意见时，坦言书稿尚未经自己完全审定，为避免回忆疏漏错讹，一切均应以最终定稿为准，显示了他一贯坚持的“无论观点怎样，总应该实事求是”的态度。

2015年底，戚老赴深圳再做书稿修改审定工作。2016年2月因胃痛和短期内体重骤降三十多斤而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扩散至肝脏、胰腺，余下的时间仅可以天来计算。但他从容面对生死，看到诊断书时非常冷静，自己决定放弃手术，只做保守治疗以加紧回忆录的最终审定出版工作。3月7日他病情迅速恶化，回到上海接受最后治疗，在病床上终于坚持完成了全书的修改审定。4月20日清晨，在听到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已将上下两卷、六十余万字的《戚本禹回忆录》付印的消息后一个多小时，7点58分，这位85岁的文革老人安然离世。——他终于跑过了死神，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无可替代的精神遗产。

戚老有二子一女，临终时亲人均陪伴身旁。

2016年2月24日在港大深圳医院确诊胃癌晚期后，戚老自己看诊断书，神态冷静安详

2016年3月2日深圳医院，蒯大富夫妇探望戚本禹

在文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戚本禹同志的逝世无疑是中国左派运动的一个重大损失，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参与其中的戚本禹等同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左派运动的重要财富，值得今天的社会主义重建者珍视和继承。

**生亦文，死亦文，禹心本有后继；**

**成也史，败也史，同志何须悲戚！**

**——这是《红色参考》送别戚本禹同志的挽联。**

戚本禹同志追悼会将于今日(4月24日)上午九点半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据悉,早在两日前上海有关方面已通知,禁止非亲属参加追悼会。

斯人已逝,理想不灭。

生当人杰,死亦鬼雄!

戚本禹同志永垂不朽!

---

4月21日香港《苹果日报》以整版报道戚本禹病逝的消息

2014年春节期间戚本禹在友人彭伟(左)陪同下于深圳修改回忆录,右为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敖本立(原文革期间中央财经学院造反派领袖)

2015年3月16日,戚本禹到东莞石碣水南村《袁崇焕纪念园》凭吊袁崇焕,在毛主席关于保护袁崇焕祠墓的批示碑刻前留影。

2012年春天,戚本禹在友人陪同下回到四川省新都大丰乡蹲点种试验田的地方,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本文选自:《参阅文章》